

学习宋庆龄爱党爱国情怀 谱写富民兴陇新时代篇章

王嘉毅

宋庆龄先生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194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承担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始终坚定地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富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国之瑰宝”,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福利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方式方法,通过特展的形式,以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巨大贡献以及宋庆龄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生平回顾为主线,通过图片、影像、实物、多媒体装置等,凸显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生动诠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最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的伟大贡献与不懈探索的光辉历程。同时,展览聚焦党史学习教育,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宋庆龄先生和中国福利会与甘肃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1937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人发起了以帮助中国工人进行生产自救、组织经济抗日战线为目的的工合运动,成立了“工合国际”。宋庆龄全力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并亲自担任工合国际名誉主席。她对路易·艾黎作出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1942年,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县创建了培黎学校,并确立了“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探索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1953年,培黎学校迁至兰州,改称“培黎石油学校”,后来成为兰州城市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甘肃站巡展正是在路易·艾黎亲手创办的培黎石油学校的继承者——兰州城市学院布展,充分体现了宋庆龄与路易·艾黎的深厚革命友谊和对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切期望,必将为我省进一步宣传宋庆龄爱党爱国爱民情怀,构筑起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建设热情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促动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要继承发扬宋庆龄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其为祖国统一、人民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甘肃红色资源大省的优势,传承弘扬红色基因,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激发红色文化活力,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汇聚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为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本文节选自2021年9月16日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嘉毅在“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全国巡展(甘肃站)开幕活动上的讲话,题目由编者所加)

培黎通讯

2021年第2期(总第37期)

主 管：中共兰州城市学院委员会
主 办：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培黎学校同学会

编委会

主 任：许尔忠 王学军
副主任：李慕堂
编 委：石 虹 冯 驱 刘国忠
张雷涛 刘晓霞 白晓霞
许立业 董 沼

编辑部

顾 问：周起秀 聂广涛 王自刚
李建平 刘世仲 王延义
杨作峻
主 编：石 虹
编 辑：董 沼 冉前林 曾桐铭
宋 福 杨文珺 郭忠宁
刘淑贤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安宁区街坊路
11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子邮箱：519187952@qq.com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网站：

<http://rarc.lzcu.edu.cn>

印 刷：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 LK000211



欢迎关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官方微信

目 录

卷首语

学习宋庆龄爱党爱国情怀 谱写富民兴陇新时代篇章
..... 王嘉毅(1)

工作动态

“新时代斯诺”国际论坛在延安举行..... (4)
中国工合举办“学习百年中共党史 传承工合红色基因”
东南行活动..... (5)
兰州城市学院举办“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
专题宣讲会..... (6)
路易·艾黎故居重启仪式暨艾黎故事图片展在京举行 (8)
“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史迹展在兰州城市学院开幕..... (9)

实录一帧

永远和党在一起 张晓敏(11)
风雨同舟五十年 李建平(12)
学习宋庆龄伟大情怀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 许尔忠(14)

高山仰止

一起干：国际友人与中国工合运动..... 柯马凯(15)

专家特稿

怀念我们的艾黎伯伯 邓邦镇(19)

学术交流

路易·艾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石 虹(23)

国际友人

宋庆龄与三位国际友人的革命友谊 张 钰(26)
纪念埃德加·斯诺..... 宋庆龄(30)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 (32)

工合之窗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对工业合作运动的支持 李贵义(34)

史料钩沉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前言..... 路易·艾黎(陈向东译)(38)

艾黎诗选

悼宋庆龄 路易·艾黎(43)

意在笔先

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及时代价值 米江霞(44)

何克专栏

中国抗战中的乔治·何克 况 鹰(48)

培黎纪事

习仲勋的培黎情结 安永香 李生广(56)

照片档案

路易·艾黎拍的红军抗洪照 刘 波(59)

文物故事

给予和平卫士的最高礼遇

——毛泽东邀请路易·艾黎参加国庆观礼请柬

..... 甘肃省文物局(61)

大事记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2021年大事记 (63)

封面刊名题字 俞 宏

封面 “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在兰州城市学院开幕

封二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

1936年春,为庆贺《中国呼声》的出版,宋庆龄特意组织大家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图为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合影 (图1)

1968年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图2)

艾黎与宋庆龄(1977年)(图3)

老而弥坚的革命友谊(图4)

1981年6月4日,路易·艾黎把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上(图5)

198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举行纪念碑的落成典礼,路易·艾黎(左二)抱病来上海参加,图为典礼上他与习仲勋(左一)等人的合影(图6)

封三 征集启事

封底 油画《路易·艾黎在工作》(作者:邓邦镇)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节选自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新时代斯诺”国际论坛在延安举行



6月18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斯诺”国际论坛在延安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陕西省副省长魏建锋、延安市长薛占海出席论坛并讲话。伊莎白·柯鲁克之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爱泼斯坦夫人黄浣碧、傅莱夫人江国珍、海伦·斯诺侄子埃里克·福斯特、汉斯·米勒与中村京子之子米德华、郑律成女儿郑小提、阳早与寒春之子阳和平等著名国际友人的亲属、部分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中方各界代表共200余人专程赴延安参会。

白求恩家族代表、加拿大一中国友协多伦多分会主席沃伦·白求恩,新西兰路易·艾黎侄女艾尔史碧斯·珊迪斯,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海伦·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英国林迈可之子詹姆斯·林赛,新西兰—中国友协主席荣大伟等外方嘉宾通过视频连线或录制视频出席论坛。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时报、澎湃网等十余家中国媒体,以及美国彭博社、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瑞士《新苏黎世报》、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韩国中央日报、柬埔寨高棉日报和《南华早报》等8家境外媒体随访延安圣地、梁家河村并现场采访报道本次论坛。

论坛期间,“斯诺图片展”同期开展,林松添、魏建锋共同为图片展揭幕。图片展用大量照片及史料,展示抗日战争期间,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先后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西方世界报道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



林松添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林松添说,此次活动的目的,一是对国际友人表达感恩之情;二是对其追求正义表达敬意之心;三是告慰他们当年的正义选择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四是期待激励更多国际有识之士弘扬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国际主义精神。

(稿件节选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网站 2021.6.18)

中国工合开展“学习百年中共党史 传承工合红色基因”东南行系列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常务理事、专家学者、专委会负责人、上海各区工合代表及部分企业家开展了“学习百年中共党史 传承工合红色基因”东南行系列活动。

6月17日,第一站大家在上海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故居。位于愚园路1315弄4号路易·艾黎故居始建于1912年,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纪念地。中国工合的灵魂人物路易·艾黎曾经在这里居住了6年时间。路易·艾黎的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与信息的联络站,陈翰笙、刘鼎、许光达、李克农等革命前辈都曾在此居住过,共产国际中国组曾在这里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国兵工泰斗刘鼎之子、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刘文石全程陪同并参观了故居,深情讲述了父亲刘鼎与宋庆龄、艾黎间的感人故事:父亲刘鼎在艾黎住所,一边养病、一边通过敌人报纸寻找党中央的踪迹;深切感怀那段艰难岁月里父亲获得的支持与帮助。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合酝酿发起的地方。中国工合从成立之初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是抗战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载体。工合从上海发起到武汉正式成立,迅速在东南、西北、西南等地区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工合事务所,聚集了国内、国外各方抗战力量,迅速构建起抵抗侵略、工业救亡的经济防线。



6月18日,东南行活动第二站在嘉兴南湖拉开序幕。东南行活动成员走进庄严的南湖革命纪念馆,通过馆内史料介绍和文物展示,共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伟大历程;在南湖大家共同瞻仰了著名的南湖红船。切身感受到南湖作为革命摇篮,中国共产党从红船扬帆起航的历史意义。

6月19日,东南行活动第三站观瞻位于屯溪老街还淳巷19号的中国工合浙皖办事处旧址。当天下午,中国工合和铜陵工合、屯溪区委、区党史部门共同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合在皖南的运动”座谈会。田玉萍理事长提出,中国工合此次组织东南行活动是围绕两个主线展开的,一是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红色足迹,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二是梳理中国工合红色基因,对工合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红色基因内涵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稿件节选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网站
2021.6.18-23)

兰州城市学院举办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专题宣讲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用好校本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6月21日晚,由兰州城市学院、兰州市安宁区委区政府主办的“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专题宣讲会在校本部音乐厅举行。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沛文,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康民,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省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刘雄文,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敏维奇、副处长孙祥宁,省友协友城处处长朱玉明,安宁区委书记郭海泉,区委副书记张吉彬,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亚军,副区长刘燕霞,校领导许尔忠、王学军、王基、牟录贵与兰州城市学院师生代表5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校党委书记许尔忠在致辞中指出,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而且也得到了众多国际友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们被吸引、被感召,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程中,

与党和人民并肩奋斗,书写了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光辉篇章。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艾黎先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他支持中国革命、发起工合运动、创办培黎学校、宣传新中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兰州城市学院作为艾黎先生教育事业的继承者,以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培黎展览馆和《培黎通讯》杂志为依托,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学校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培育时代新人营造了浓厚氛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表示,兰州城市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将弘扬艾黎精神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载体,着力讲好“路易·艾黎与中国共产党、路易·艾黎与新中国、路易·艾黎与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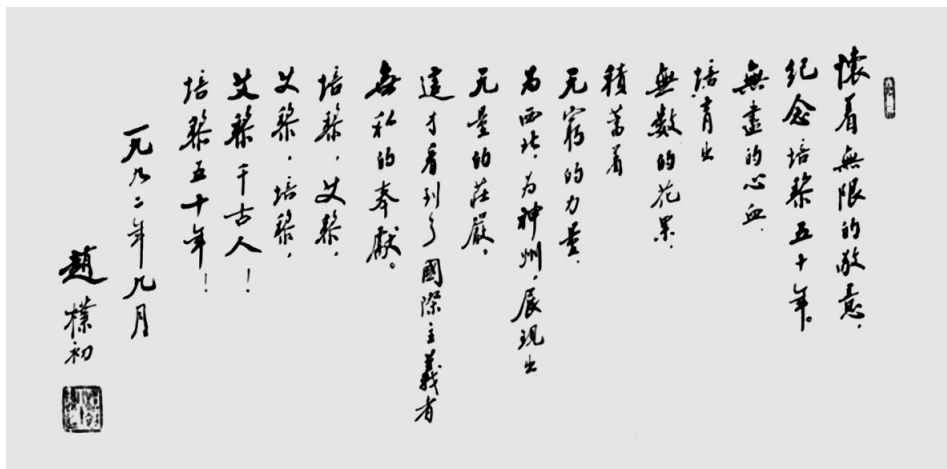


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致辞

宣讲会上,甘肃省朗诵协会副主席张宇作为串讲人,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梳理了艾黎先生的生平。来自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小学的师生代表,山丹艾黎纪念馆、安宁区培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等,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为大家呈现艾黎先生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同向同行的感人事迹,深度诠释了以“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实践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艾黎精神,分享了校、地学习艾黎事迹、延续培黎文化、弘扬艾黎精神的心得体会。其中,《艾黎与中国革命二三事》讲述了艾黎在新中国成立前,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地下组织兑换钞票,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见面,以及组织师生帮助解放军运送部队、救护

宣讲会激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反响。宣讲活动还通过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央视频、甘肃文化影视频道视频号,安宁区融媒体中心,以及兰州城市学院官方抖音、微博进行了网络直播,收看人数超30万人次。

(稿件节选自兰州城市学院网站2021.6.22)



赵朴初先生为培黎学校五十周年题写的诗句

路易·艾黎故居重启仪式 暨艾黎故事图片展在京举行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为表达对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所有曾经理解、支持和帮助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们致以崇高敬意和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7月10日“友好日”期间隆重举办“路易·艾黎故居重启仪式暨艾黎故事图片展”。

林松添会长、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姜江,著名国际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来自2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或代办,工合国际主席柯马凯,新西兰驻华使馆政务参赞博超,著名国际友人马海德、汉斯·米勒、郑律成的亲属等50余人出席活动。

林松添在致辞中表示,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共有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友人安娜·斯特朗、罗伯特·威廉,智利友人万徒勒里,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5位著名的国际友人在本会居住生活,其中艾黎是居住最久的一位。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好同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深受中国人民爱戴。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新开放艾黎故居,并举办艾黎故事图片展,意义重大。一是要缅怀和感谢艾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二是要告慰艾黎等国际友人,他们当年作出的正义选择是正确的。三是要展现我们传承和弘扬艾黎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坚定决心。

林松添说,当年,艾黎等国际友人以友协为家,致力于增进中外友好,共同谱写了中新、中外人民友谊的赞歌。今天的友协大院,再次高朋云集,奏响了中外新时代友谊的序曲。让我们以艾老为榜样,携手努力,共同构筑人民友谊的桥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周幼马、柯马凯深情回顾了艾黎与马海德等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感人故事,以及艾黎发起工合运动、支持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事迹,表示如果国际友人们得知,他们的事迹直到今天仍激励着这么多中外朋友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他们一定会深感欣慰和自豪。

新西兰驻华使馆博超参赞代表傅恩莱大使向艾黎故居重启暨艾黎故事图片展活动致以热烈祝贺,并表示,艾黎是新中国人民友好的重要象征,希望两国人民继续将艾黎精神发扬广大,加深相互理解、友谊与互利合作。

重启仪式结束后,林松添带领与会各国使节和嘉宾共同参观了艾黎故事图片展。

(稿件节选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网站 2021.7.10)

“永远和党在一起” 宋庆龄史迹展在兰州城市学院开幕



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致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9月16日,由中国福利会主办,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作为支持单位,兰州城市学院和中福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甘肃站在我校培黎校区开幕。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负建民,民政部原副部长、中福会副主席顾朝曦,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福会副主席姜樑,中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张晓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路易·艾黎秘书李建平,

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的中福会执委、执委单位代表和友好合作单位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有关单位负责人,中福会机关、直属单位负责人,校领导许尔忠、王学军、王基、姜秋霞、莫超、李慕堂、牟录贵、方忠义等领导嘉宾和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开幕活动。仪式由校党委书记许尔忠主持。

王家瑞、王嘉毅、负建民、顾朝曦、姜樑、张晓敏、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王春江、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李建平共同启动了展览。

王嘉毅在致辞中指出,本次甘肃站巡展在路易·艾黎亲手创办的培黎石油学校的继承者——兰州城市学院布展,充分体现了宋庆龄与路易·艾黎的深厚革命友谊和对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切期望,必将为甘肃省进一步弘扬宋庆龄爱党爱国爱民情怀,构筑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建设热情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促动力。

许尔忠在主持仪式时表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宋庆龄史迹展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载体。兰州城市学院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宋庆龄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出更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王家瑞一行参观了“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展览馆和我校艺术设计学院陶艺工作室。宋庆龄史迹展通过图片、影像、实物、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生动诠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最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探索,再现宋庆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缔造未来的

大爱情怀,从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展览将在我校持续展出两个月,学校将组织全体师生分批参观展览。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福利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福利会与我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稿件节选自兰州城市学院网站2021.9.18)

宋庆龄颂

爱泼斯坦

怀念你啊,已经三易星霜,
你以美、勇敢、坚贞,为我们的时代增光。
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胜利中的一部
欢快乐章。
上海姑娘,
热情、沉静、闪闪发光,你的成长多么不
寻常。
受的是外国教育,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
选择的是斗争道路,尽管在安乐中生长。
跟前线的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共患难的则是地下的共产党,
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儿童、未来的
希望,
当空是启明星的曙光。
谦虚,却受到全世界的景仰,
优美,却永远不屈不挠,
温和,却像钢铁一样坚强。
比你的汉白玉雕像还要持久,
你那压制不住的精神力量,
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
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
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写于1984年1月
27日,原载《中国建设》1984年第5期)

永远和党在一起

张晓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国福利会主办的“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今天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福利会,对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关心,对兰州城市学院和上海银行的通力合作表示衷心感谢。

宋庆龄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中国福利会创始人。她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富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她被誉为“国之瑰宝”,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庆龄和甘肃有着深厚的渊源。她全力支持以路易·艾黎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发起的“工合运动”,80年前,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起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为工合筹募资金。宋庆龄始终将由路易·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视为最重要的援助单位和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也是在宋庆龄的感召和影响下,路易·艾黎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促进中国的民间外交和国际宣传,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陕甘宁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实用技术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今日开幕的宋庆龄史迹展,将通过图文、影像、多媒体互动等方式,生动诠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最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探索,最终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伟大历程,是一部激励我们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生动教材。展览专设的“宋庆龄与路易·艾黎”板块,以独特视角为全国范围、社会各界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创新示范。

本次展览的主题“永远和党在一起”,源自宋庆龄1958年在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从中国福利会成立之始,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八十多年来,“永远和党在一起”已成为一代代中福会人的行动指针。

中国福利会将继续秉持“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的贺信重要指示精神,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继续致力于缔造未来的事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本文是中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张晓敏在“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甘肃站)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风雨同舟五十年

李建平



艾黎作为一个新西兰人，在远离自己祖国的中华大地上工作生活了60年并做出重要贡献，除了他本身的高尚品德和努力奋斗以外，宋庆龄对他的引导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艾黎本来就是一个健康上进的青年，1933年结识宋庆龄以后，思想觉悟得到升华，认定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宋庆龄的影响和引导下，艾黎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建立秘密联系，他的家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的避难场所，阁楼上安装着共产国际中国小组的电台。艾黎与宋庆龄等少数几个朋友在艾黎家里秘密庆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艾黎为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呼声》杂志撰写思想进步的文章。作为中共代表在张学良身边做地下工作并为西安事变立下功劳的刘鼎就是艾黎推荐给宋庆龄又推荐给张学良的。为协助共产党筹集经费，艾黎冒着生命危险去太原将红军缴获的巨额山西地方钞票兑换成通用法币，带回上海交

给宋庆龄转延安。艾黎做的许多协助共产党的工作都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完成的。

艾黎创办的工合和培校，也都得到了宋庆龄的鼎力支持。1938年成立工合前艾黎事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1945年艾黎开始长住山丹筹建山丹培黎学校，即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宋庆龄继续给予极大的关心和一如既往的支持，并将山丹培黎学校列入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重点援助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自1952年起，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参加由宋庆龄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宋庆龄一道为世界和平奔走。

文革期间艾黎也遭怀疑，宋庆龄得知后于1968年8月31日亲笔出具证明信，铿锵有力地写到：“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正是有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保护，艾黎才奇迹般地免遭迫害。

在艾黎的晚年我有幸为他做秘书工作5年多，亲身感受到艾黎和宋庆龄的终生友情。我们秘书曾多次为艾黎送信给宋庆龄，艾黎在信封上只写“林泰”两字，我们到宋庆龄的住处门口，轻轻敲一敲大铁门上的小窗，从窗口递进去交给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宋庆龄给艾黎来信，一般由她的司机送来。十分遗憾的是，艾黎和宋庆龄的来往书信保存下来的极少，因为他们从30年代开始就约定，信

件看过之后就立即销毁,不保留。

宋庆龄逝世艾黎心里非常难过沉痛,他去大会堂参加宋庆龄的追悼会,去上海参加宋庆龄的骨灰安葬仪式,为《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工人日报》《中国建设》等媒体撰写纪念文章,表达他对宋庆龄的哀思。

宋庆龄逝世后,宋庆龄基金会还于1984年12月18日捐款5万元资助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学校,宋庆龄故居于1986年3月17日还送给艾黎当时难得一见的夏威夷鹅掌花。两位伟人的不灭友情感动之至。

艾黎与宋庆龄能有五十载始终不渝的友

情,是基于他们对世界和平和命运相连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向往。我们要学习和弘扬艾黎和宋庆龄两位伟人的高尚品德和不懈奋斗精神,永远和党在一起。

中福会把今天这个展览安排在有着光荣历史和红色基因的兰州城市学院举行,是最合适不过了。

(本文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艾黎秘书李建平在“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甘肃站)开幕式上的致辞摘要)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勿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和谐和一致的。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机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同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理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是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摘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所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

学习宋庆龄伟大情怀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许尔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始终致力于探索民族救亡图存道路,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谋求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心使命与宋庆龄的思想情怀的结合点。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回顾宋庆龄先生毕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矢志不渝、不懈奋斗的光辉过往。

我们学校前身是由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新西兰国际友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创办的培黎石油学校。本次展览特别展示了路易·艾黎在宋庆龄的感召和引领下,萌发对中国的红色情缘,发起工合运动、创办培黎学校,与宋庆龄风雨同舟五十载的不凡足迹。

宋庆龄史迹展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

近现代最先进分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探索的历史呈现,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的生动载体。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利会,继承和发扬宋庆龄“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办会宗旨,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坚持高标准、高质量,走强会之路,事业板块涵盖妇幼保健、学前教育、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儿童戏剧、少儿出版、老年福利及公募基金等八大领域。

“永远和党在一起”是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也是宋庆龄终生践行的坚定信念。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祖国大地留下了无数革命先辈们奋斗的足迹,传承着他们信仰的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回顾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重温她“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本文是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在“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甘肃站)开幕式上的主持词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起干：国际友人与中国工合运动

柯马凯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路易·
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柯马凯先生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简称，也意为“一起干”，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合作、勇敢、开拓的象征。工合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由中外进步人士共同发起的以生产自救进行抗战的工业合作化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中国民主进步势力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朝野人士的大力支持。工合运动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和物资支援，而且增进了中国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国抗战争取了积极的国际援助，也是当时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在抗战的危急关头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

工合的成就与许多国际友人的参与、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活动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协会）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工合国

际）仍然吸引了许多在华工作的国际友人，他们为工合的发展献计献策，努力推动新时期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工合国际委员会回信，在肯定工合国际工作的同时，也希望工合国际能够在新的时期“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筹备：在华外国人倡议

1938年4月3日，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成立，委员会共有11人，其中就包括提出建立工业合作社这一构想的小组成员，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及夫人海伦·斯诺（Helen Snow），时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厂督察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以及为这一思想提供启示、热心合作社事业的英国驻华大使馆青年秘书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而在此之前的3月19日，他们四个人已经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对在中国发展工业合作运动的构想进行了讨论。虽然此前艾黎曾与在上海的爱国人士和外国人就如何在中国的大后方开展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进行过讨论，但把工业生产和合作社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工业合作运动来在中国各地发展工业，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持中国经济抗战的构想首先是海伦·斯诺提出

的。艾黎在他已有的工业工作材料的基础上,把这一想法融入,起草了在未沦陷区建立一系列小型合作社的具体计划草案,提交给了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讨论,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支持。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兼任过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向世界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中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让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士了解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以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诺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在上海工作期间与海伦·斯诺、艾黎等人一起发起了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运动的倡议,并为这一运动的开展竭尽全力。正是埃德加·斯诺带着他和艾黎起草的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书,去争取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的支持。

海伦·福斯特·斯诺于1931年8月来到中国,1932年与在华工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1937年,海伦·斯诺历尽千辛万苦,独自访问延安,并根据采访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1937年年底,海伦·斯诺到上海与丈夫埃德加·斯诺团聚,随艾黎了解了日本轰炸后的上海工厂的萧条状况,积极参与埃德加·斯诺与艾黎关于如何组织失业工人、难民开展生产自救发展工业的讨论,首先提出了工业合作运动的想法。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于1927年来到中

国,先后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虹口救火队和工业科工作,在担任工厂督察期间,了解工厂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撰写了很多有关工业发展的报告。1934年与在上海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经常带领到上海的外国人参观工厂,让他们了解中国工人的生活生产情况。上海沦陷后,大量工人失业,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艾黎便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自己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撰写了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计划。在与斯诺夫妇多次讨论后,负责起草了最初的有关工业合作运动的计划。

约翰·亚历山大是英国驻华使馆的年轻秘书,他非常热心合作社事业,是一位合作社主义者。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合作社都是民主的基础,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他的这一观点启迪了海伦·斯诺发展工业合作社的想法。约翰秘密参与了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的讨论,是第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的11位成员之一,并被推选为委员会的秘书,匿名参与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的工作。也正是约翰的积极工作,激发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对这一计划的兴趣,很快,约翰就把埃德加·斯诺带到了克尔大使的办公室。

至于在中国发展工业合作社运动为什么由几个在华的外国人首先倡议,侯德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倡议开展工业合作运动的这几位外国人都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憎恨日本法西斯,他们都有在华生活与工作的较长经历,善于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及其症结、对日本侵华给中国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中国的抗战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并感受到了合作社对于

救贫扶困的重要的意义。

成立:谁是幕后英雄?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计划制定后,为了把这一计划变成切实可行的行动,促进委员会的每位成员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寻求社会各界对这一计划的支持。这其中,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两位热心人士的支持和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 1882 年 3 月 17 日出生在澳大利亚,1906 年正式开启了他的外交工作生涯。1938 年克尔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直到 1942 年被迫离开。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有独立政见。他喜欢旅行和结交朋友,喜欢亲自了解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他公开反对轴心国,反对日本。他是职业外交家,官运亨通,年轻有为,但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1938 年 1 月,当周恩来拜访克尔大使商谈中共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事时,他不仅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而且还致电港英当局,帮助中共秘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克尔在到中国工作之前,就读了刚刚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对他了解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尔大使一到中国上任,就约见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当斯诺带着工业合作社发展计划书去见克尔时,他认真全面地了解了这个计划,并向斯诺表示将尽力协助推进这一计划,但是要求斯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参与此事。之后克尔很快地将计划送给蒋介石夫人,同时建议将艾黎召来汉口共商实施这一方案的事宜。最后,国民政府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指导开展工业合作社的工作,艾黎也被任命为工合协会的首席技术顾问,

这样工合运动就正式在 1938 年 8 月份启动。

虽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已于 1938 年 8 月 5 日在汉口宣告正式成立,但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除了技术和管理干部缺乏外,工作经费始终是一个问题。为此,克尔大使运用外交手段及其他方面的推动工作,促使孔祥熙拿出一些钱支持工合的工作。同时,克尔大使还争取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响应宋庆龄的提议,于 1939 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工合国际接受各方的赠款、借款、物资和技术援助等支持国内的工业合作社运动,香港的主教罗纳德·霍尔(何明华, Rev.R.O.Hall)任工合国际的主席,抽出许多时间从事工合国际的工作。

1941 年,当克尔大使从周恩来处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后,致电英国政府指出,中国的内战只对日本有利,要求政府施压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克尔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成就有深入的了解,他公开演讲呼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国民党认为他已被中共“赤化”,是危险的红色人物,最终迫使英国政府将克尔调离。

发展:谱写国际友谊的美丽篇章

在工合运动的开展过程中,许多认同工合理念、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以各种方式给予工合运动大力支持,这些支持主要体现在技术培训、资金筹集、宣传以及参与实地工作等方面。在工合技术人才培训和合作社发展技术方面,如金陵大学工作的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ewis S.C.Smythe)、农学院农业工程技术教授林查理(Charles H. Riggs),曾在燕京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与甘肃科学研究所密切关系的戴乐仁(T.B.Taylor)等都为工合的技术发展提供培训和指导。约瑟夫·培黎(Joseph Bailie)的很多弟子直接参与了工

合作社的实际指导工作。英国青年乔治·何克(George Hogg)担任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专门从事工合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培训。许多公益救护队的成员、国际友好组织的人士到培黎学校担任教学工作,为工合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人才基础。

资金筹措方面,在上海工作的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在贵阳工作的陆慕德(Maud Russell)等都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募集工合发展资金。在香港,邱茉莉(El sie Fairfax-Cholmel e y)等人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也积极投入到为工合筹集资金的工作中。工业合作社运动创造了一种国际合作的国际主义工合精神。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成立了工合促进会。上海、香港、成都的促进会成员大约有70位,其中约一半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且整个促进会的工作都是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促进会里没有一个人从中国政府那里领到任何津贴或者工资。

工合的工作得到全世界对工合运动感兴趣的人士的支持,许多国家建起了援助中国工合促进委员会,为工合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1939年4月20日,菲律宾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在马尼拉成立,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妻子保尔·麦纳特女士(Mrs. Paul V. McNutt)任名誉主席,沃尔特·布鲁克斯·弗利博士(Dr. Walter Brooks Foley)任主席,这也是国外第一个援助中国工合的促进会。1939年6月,在英国成立了英中合作发展协会,目的是为中国工合提供帮助和交换,英国下议院议员艾尔弗雷德·巴恩斯(Alfred Barnes)被推选为主席,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另外三个议员也被推选担任理事。此外,在英国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和左翼书刊俱乐部也筹集资金支持中国

工合运动。1939年年底,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派蒲爱德(Ida Pruitt)前往美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就为工合筹集到一万美元的自发捐款。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Mrs. Franklin D. Roosevelt)同意担任美国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全国发起人时,工作得到很大推动,“促进中国工合美国委员会”也正式成立,委员会有100多名顾问,20位董事会成员,海军上将哈里·亚内尔(Harry E. Yarnell)担任董事会主席。1940年1月,澳大利亚工合促进委员会在墨尔本成立,主席为澳大利亚铁路联合会秘书长恰普勒(J. F. Chapple),最活跃的推动者有格兰特(Al e c D. Grant)等,他在菲律宾旅游时得知有关中国工合运动的消息,很快就成了这一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此外,还有许多国家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促进会,但了解中国工合运动的人们仍然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了支持,如法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缅甸、泰国等。据统计,截至1945年年底,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和工合运动作出重要贡献。可以说,工合把许多爱好和平,憎恨战争,支持中国人民通过生产自救改善生计并取得抗战胜利的人们联系了起来,谱写了一曲国际友谊的美丽篇章。

恢复: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

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工合终止了活动,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艾黎看到了恢复工合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机会,远在美国的海伦·斯诺也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并且积极行动起来,找了一批人把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自己担任主席,推动新时期的工合工作。

(下转第64页)

怀念我们的艾黎伯伯

邓邦镇



邓邦镇 卢波夫妇介绍创作的油画《三个老朋友》

1991年5月29日上午,在我们正式把我画的油画《路易·艾黎和中国的孩子们》及我妻子卢波创作的《路易·艾黎》铜像赠送给新西兰之前,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二楼大厅里,热情的主人神秘地请我们看该馆收藏的一些速写和素描画,问我们是谁画的。我一时看呆了。卢波惊奇地说:“这不是你画的画吗!”这确实使我非常意外,没有想到在新西兰又看到我少年时期的画,而且保存得那么完好!其中有画南镇的水彩像,有画四镇、摩托和继禹等的铅笔速写,也有我画的陶渊明的素描插图等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些我十五六岁时画的画,是路易·艾黎30多年前寄给他在新西兰的亲友的,后来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里。

我自幼年就失去了父母。40多年前认识路易·艾黎之后,我和我的姐姐及两个几岁的弟弟就成了艾黎大家庭的一部分,从此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和照顾。他那无私深沉的爱,使我们这些饱受磨难的幼小心灵

得到抚慰和温暖。从上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工作和建立家庭,我们的许多生活经历都是同路易·艾黎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他一直在指导、帮助我们成长。我的妻子卢波从大学时期起的26年间,也一直深得路易的关怀,特别是在事业上,他曾格外地给她支持和鼓励。我赠送给新西兰——艾老的祖国的画,画的是艾伯伯和中国孩子们的一组群像。当年的我们正是像这群像中的中国孩子一样偎在艾黎伯伯的身边,得到他最无私的爱。

难忘的一天

那是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年——1951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伯母夏明领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去看望她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对艾黎一无所知,现在也记不清是怎样去的了,只记得艾伯伯的住处是在一条小街里的老式平房院中。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个戴着灰色八角帽、穿中国灰制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他就是路易·艾黎。他的亲切和热情,使我们这些进城不久的农村孩子很快就忘掉了紧张和陌生。他的房子里不同于我们家,有地毯和暖气。一进屋路易就忙着帮我们脱去棉衣、棉裤,一面帮我们脱一面风趣地说:“28件衣服。”而后就是分发糖果和玩具画书等。我们这群孩子就像是进了一个游艺室,自由自在地在他的房间的各个角落玩耍。

事隔40多年了,这第一次和艾伯伯见面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都还很小,

最大的是“摩托”，12岁，我是9岁，最小的弟弟四镇只有4岁。当我们都坐在地毯上翻看他为我们准备的连环画时，艾伯伯和夏明伯母在一边坐着小声谈着话，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十分和蔼地看看这个孩子又看看那个孩子。

那次见面，艾伯伯已经50多岁了，可身体非常健壮。那天，他的情绪也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们一起玩。带我们做的游戏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他爬在地毯上，说自己是头大象，一会儿又说是一匹大马，轮番驮着我们在屋里爬着走。他同时驮着我和南镇、四镇两个弟弟，一面在房间里转圈，一面不停地摇晃着。这个游戏使我们又紧张又开心，我们同长辈在一起从未这样亲热愉快地玩过。艾伯伯一会儿把臀部突然抬高，把头部贴近地面，一会儿又抬高头，降低臀部，我们一不留心就会滚落“马”下，逗得伯母哈哈大笑。

这第一次同艾伯伯见面，在我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那是我童年的生活中非常特别和快乐的一天。自此以后，艾伯伯在北京的时间，我们常去他那里玩。他于1953年定居北京后，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寄宿的学校回来就去艾伯伯的住处，在他那里吃饭、洗澡、换衣服，有时星期天他还会带我们外出游玩。我们大些后，星期天也常帮他做些事，如把照片装成相册；艾伯伯翻译一些中文材料时，我们给他读中文，他用打字机打成英文等等。

鼓励我学绘画

我自幼喜爱画画，在小学阶段画了很多画，也做了不少雕刻，其中有些参加了国际儿童美术展览，有的还得了奖，如：用滑石雕刻的浮雕帆船《乘风破浪》，1954年在波兰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儿童美术展览”中获奖；一幅表现一群孩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工地前踢足球的画，在1955年世界保卫儿童委员会于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儿童画展中获奖。

当艾伯伯知道我得奖的事后由衷地高兴。我很幸运，在他发现我的美术才能之后，在我几十年学习美术到从事美术工作的道路上，他给了我始终不渝的关心、鼓励和帮助。

我从上初中开始学习素描、水彩和油画等，画了大量的风景、静物和人物写生以及创作画。为此，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课余时间。为了督促也是为了鼓励我，艾伯伯要求我每个周末向他交“作业”，把我在学校一周内画的画带回家给他看。他总是很高兴很认真地看我的每张作业，并说出他的意见。我的每批作业总能在艾伯伯那里得到很多鼓励。这些作业，要在他那里放一周的时间，他要拿给他的朋友们看，并把他们的评价也告诉我。那时，有位在中国治疗手掌关节病的澳大利亚朋友常来艾伯伯家。一次，我和艾伯伯同他一起吃饭时，艾伯伯把我的画拿给他看，这位朋友很赞扬我画的一些画，分别时他用汉语对我说：“你现在是小画家，还不是大画家，不要骄傲。”他回澳大利亚前曾通过艾伯伯转送给我一块十分贵重的手表。在我中学阶段，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是艾伯伯的邻居，他看过我很多画，曾经当着艾伯伯的面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画画，因语言不通我没跟他去；后来我长大些时才知道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失去了一次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自上初中开始，艾伯伯开始让我为他写的书画插图。他像布置作业一样，在我返校之前给我出题目，让我带到学校去用课余时间画，周末交稿。有时星期天，艾伯伯在餐桌上他惯坐的位置上为我准备好纸和笔，让我坐下听他讲一段他书中写的故事，并同我讨论如何画这幅插图，然后我就按他的意思构思画面。一般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单色的插图。我在读中学期间，艾伯伯让我画过陶渊明、杜甫、张思德、路易斯·斯特朗、乔治·何

克以及一位医生的故事等插图。艾伯伯让我画这些插图,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为了鼓励我画画,也是为了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在我为他画好一幅插图或其他画之后,他总是立即发给我“稿费”,并为我存入银行,等我需要时自己支取。这些钱基本上都用于我假期到外地写生旅行了。

中学阶段我曾骑自行车去过天津、塘沽和大连,又步行漫游过湖南省与广东省交界的南岭地区。艾伯伯很支持我的这种活动,给我讲过不少旅行知识。我像一个探险家一样旅行写生,凭着一张省份大地图和一个大指南针,时常风餐露宿,在大自然里一走就是一个假期。它使我了解社会和了解大自然,增强了生活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我画画的水平。

艾伯伯对我画画的鼓励是很多的。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1956年的一个节日的晚上。那时他还住在老北京饭店,我从阳台上远看天安门广场灯光闪烁的夜景十分迷人,于是拿出油画箱打算在阳台上画一幅夜景写生。艾伯伯忙着为我接电源,在我身边摆上椅子、放上台灯,忙了好一阵子,可是灯光的位置还是不合适,最后他干脆自己用手举着灯照着让我画这幅画。我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就这样站在我的身边为我举了一个多小时的灯。那时我仅14岁,还不懂事。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爱护和关心,一直是我学习和工作的巨大动力,直至今日,我闭上眼睛,当年艾伯伯为我举灯的情景仍浮现在眼前。他的这盏“灯”,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

我于195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又在196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终于走上了专业学习美术的道路。

1961年8月31日上午,我准备带着行李到中央美院去报到,便先到了艾伯伯家。艾伯伯为我考入竞争激烈的中国美术最高学府

感到十分高兴,他说我的头发长了,要给我理发。从小,他就常给我理发,只要把衣服脱去,往凳子上一坐,艾伯伯拿来理发推子就可以开始理了。这回理发虽然感觉与以往不大相同,用的时间特别长一些,但我的心里完全没有在意。我从小就没有照镜子的习惯,匆匆在卫生间冲洗了头;艾伯伯正坐在工作室的转椅上等着我,我路过他的身边向他道别,就从工作间通往阳台的门走出去。刚走出几步,艾伯伯拿着一顶他的湛蓝色的呢帽追出来扣在我的头上,狡黠地笑着说:“天要下雨,别感冒了!”我只好戴着帽子去学校了。到了中央美术学院报到后,在油画一年级的宿舍放好行李,我就把已使我捂出汗的呢帽摔在自己的床铺上到校园各处转悠去了。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走到哪里,那里的同学就会瞧着我笑,笑得我心里发窘。我生气地抓住一个也在笑我的一起考入大学的附中同学问他:“为什么笑我?”他忍不住哧哧地笑着说:“谁给你理的发?梯田似的。”我顿时明白了。学校离艾伯伯的住处很近,报完到后也没事,就走向艾伯伯家,对艾伯伯说:“你给我理的发很难看!别人都笑话我呢!”艾伯伯听后抱歉地笑着说:“我只会理光头、平头,你上大学了,我想该给你理个分头了,但我的技术不行……”当时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艾伯伯心里有多么高兴!

不能忘记的深情

艾伯伯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深情是我不能忘怀的。我们离开北京之后的20余年间,他总是在挂念我们。“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妻子卢波被“分配”到河南,当然也被整了几年。我们的信艾伯伯收不到,我们也见不到他本人。艾伯伯很不放心,1972年5月他来河南访问,向当时有关方面提出要求见我们,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在郑州”。他激动地

说：“邓邦镇是邓中夏的侄子，你们让见我要见，你们不让见我也要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让我们见面了。我们在一起愉快地过了一天。以后数年间，平均每年他都会到我们工作的河南、河北访问一次以上，而每次都会有一天和我们在一起。每次这样的日子，都像是我们家庭的节日。

我和卢波有作品在北京展出的时候，对艾伯伯来说也是一件喜事。他是我们的作品最热心的观众和保护者，总是急不可待地去展览会看我们的新作品。如1979年的第五届全国美术展览，我和卢波都有作品入选参展，但由于组织工作上的混乱，作品送到北京两个月了还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厅里放着。艾伯伯很不放心，他特别担心卢波的雕像作品《渠水清凉》会被碰坏了。他说：“展出不展出不重要，别把雕塑摔坏了。”因为这种事在那时候也是常有的。艾伯伯一定要让我领他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看。我们到了美术馆，展厅是锁着的，看不到，据说拿钥匙的人没有上班，我们只好遗憾地回家了。不记得过了多少天，总算等到了全国美术展览开幕，我们陪着艾伯伯去看了展览。过了两天艾伯伯的秘书小李说，艾伯伯那次看了展览的第二天，自己又专门到美术馆去看我们的两件作品，他还特地站在我们作品附近看观众的反应。展览未结束我们就回了郑州。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馆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们说，展览刚结束，艾伯伯就领人去美术馆把我们的两件作品取回家了。我的油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卢波的雕塑作品一直放置在他的客厅里。

在艾伯伯的晚年，我们希望能尽力照顾他、陪伴他。从1980年冬天开始，他去海南岛过冬时我几乎年年陪他去，为此我年年都想法筹备我去海南岛的费用。1985年冬，马海德医生建议让卢波一起去海南岛，艾伯伯和马老都

在经济上资助了她，这对卢波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平常，艾伯伯在家事情太多，客人不断，在海南岛则清静多了。卢波利用每天下午喝茶的时间为两位老人各做了一个很好的塑像，每个塑像各翻制了一件铜像和一件玻璃钢像。艾伯伯的铜像现在被收藏在新西兰惠灵顿的国家图书馆，艾伯伯的玻璃钢像则被收藏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艾伯伯多病的年月，我尽量争取到北京去照顾他、陪伴他，他是最亲的人。但一生总是习惯关心照顾别人的艾伯伯，连我为他做一些事他有时候都会说：“我又剥削你了。”我对他说：“我一生得到您那么多关心、照顾，您为我做了那么多，我该怎么说呢！我为您做得再多也是微不足道的！”

艾伯伯不喜欢现在美术界时髦的一些胡搞的“艺术”，他说：“美术应该是美的，它应使人们更加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它应能激发人们为更美好的未来去奋斗，不然要美术干什么！”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教导。

1991年7月开始，在新西兰政府、新中友好协会和艾老的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的人们支持下，我和卢波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艾老的出生地的高速公路旁边的一片草地上，为他立了一座纪念雕塑——在一块立在大地上的“巨石”上，用浮雕的形式雕塑着路易·艾黎和他的中国学生。我们是在艾老出生的那所房子旁边的一栋剪羊毛的房子里创作这座雕塑的，房子的女主人不无感慨地说：“路易·艾黎在这里出生的时候，谁会想到90多年后，会从遥远的中国来两位艺术家为他做纪念雕像！”

（本文来源自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作者：邓邦镇，画家，路易·艾黎亲友、革命先驱邓中夏侄子，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路易·艾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石 虹



路易·艾黎

在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外国友人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所吸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毕生精力乃至生命。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合”运动重要发起人之一、培黎学校的创始人。早在1934年他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其后的60年间,他始终笔耕不辍地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推动着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

1. 从“工合”运动到培黎学校

1927年,路易·艾黎到达上海后,在租界就职消防督察。他深入了解到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亲眼目睹反动统治者的残忍行径,他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1934年,艾黎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此后,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阅读进步书籍,关心中

国国内斗争,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1936年3月,艾黎与格兰尼奇夫妇创办了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并担任长期撰稿人,艾黎撰写了许多文章描述战争风雨欲来之际上海当地的情景。

此后,路易·艾黎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一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胡愈之、徐新六、卢广绵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1938年8月5日,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简称“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民生主义”为使命,通过组织工业生产,争取国际援助,支援抗战前线斗争,被誉为“后方经济堡垒”,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工合”组建成立,艾黎整整艰辛工作和奔波了6年。哪里有合作社,哪里就有艾黎的身影。

1942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今凤县)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他取名“培黎”即有“为黎明而培训”之意。由于战争蔓延,学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在山丹,艾黎全身心地投入到培黎学校的工作中,努力探索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半工半读、手脑并用的新型教育。在山丹培黎学校,学生们在没有技术员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在实践中摸索。艾黎同他们一起研究,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然后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同时,艾黎根据学校的发展,增加实践项目,让学生们学到更多的实践经验。为了给山丹培黎学校筹集办学资

金,艾黎写信呼吁争取国际社会对学校发展的支持和援助,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学校得到了来自海外的大量物资及教学设备的捐助,并邀请到来自8个国家的近30名专家、工程师和技师先后来校任教。

2. 笔耕不辍向世界介绍中国

艾黎说:“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新中国成立后,艾黎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新中国,努力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1952年,艾黎参加了在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大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当选为联络委员会的委员。1953年,艾黎到北京定居,把介绍报道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作为自己新的工作。他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广交世界各国朋友,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发表演讲,传递“中国声音”,向世界各国打开了解新中国的窗口,加深各主要国际组织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国际友好事业发展。

为了真实而全面地向世界宣传中国,他坚持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访问,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城镇,又有乡村,把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报道文章和书籍,向中央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他经常在外媒报刊上发表朴素真挚的诗作,翻译出版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以加强和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艾黎的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语言通俗易懂。他先后发表了《人民有力量》《人道的中国》《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中国历史故事》《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好风集》等著作,以纪实、

散文、游记、诗歌等多种形式,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同时,艾黎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中国陶瓷器艺术,翻译出版了《唐宋诗选》《少数民族诗歌选》《胡笳十八拍》以及杜甫、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选集,写下《瓷国游历记》,以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向世界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3. 推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断绝往来,但艾黎始终认为这种情况可以改变。他锲而不舍地给家人写信,在新西兰报纸上发表文章和评论,向新西兰政府表达他的看法。他说,“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新西兰人,我感到有责任明确地、毫不掩饰地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祖国的人民”。艾黎为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1972年中国和新西兰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促进作用。

艾黎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香港《东方地平线》杂志投稿,直到1976年该杂志停刊,他还向香港英文周报《大公报》投稿达25年之久。艾黎邀请两家杂志社将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本新年小画册,登载他每年在全国各地随时拍摄的中国儿童照片,并配上表达美好祝福的诗,寄给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

鉴于艾黎先生在国际文化传播方面的突出贡献,1972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艾黎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83年艾黎被中国笔会中心接纳为第一位外籍会员。

艾黎于1952年倡导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为促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推动下,新中友协积极开展友好交流活动,每年组织新西兰代表团访华,为甘肃等西部地区的工合事业与学校在资金、物资、人员等多方面提供帮助。1984

年,艾黎积极促成家乡克赖斯特彻奇市与甘肃省结为友好城市关系。艾黎曾说,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给了他一项为之奋斗的事业。1982年,艾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被新西兰政府授予“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同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

在中国生活的60年,无论在国内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本文刊登于《甘肃日报》2021.8.12,作者系兰州城市学院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Gung Ho 词汇传播者:埃文斯·卡尔逊

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 1896-1947)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美国驻华领事馆的武官。抗战时期,他是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考察的外国军人。他获得许多一手资料,撰文著述,宣传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还把工合口号介绍到美国军队,使Gung Ho成为美语单词。1938年年底,卡尔逊向美国海军军部递交快乐辞呈。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途中,他经过菲律宾,专程去碧瑶与斯诺夫妇共度感恩节。在碧瑶,他还遇见了路易·艾黎。他们志趣相投,探讨了中国局势。

卡尔逊与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的友谊,也让他了解到中国工合运动。1940年,卡尔逊第四次来到中国,他与路易·艾黎一起考察了中国南方9个省的工合运动,考察了皖南的新四军。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有4封信汇报中国的工合运动。卡尔逊信中表示,工业合作社运动可能是中国战争潜能中最重要的、独立的力量,中国成为了工业合作社的一个“试管”。

1941年,卡尔逊再次从军,被任命为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大队队长。他在部队中参照八路军的管理方式,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和军事民主,让士兵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他把工合Gung Ho一词确定为官兵的口号,士兵们冲锋上阵时,高喊Gung Ho口号,这个词由此在美国海军中流传。

1942年8月,卡尔逊率领部队利用游击战法,成功偷袭了日军占领的太平洋上的马金岛,这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此后,卡尔逊屡立战功,晋升为准将。

1943年,美国上映了以卡尔逊为原型的电影《孤岛突击队》,英文名是Gung Ho,意思是同心协力。影片展现了卡尔逊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夺回金马岛的军事胜利,宣传了战斗中的“卡尔逊攻略”,他采用的战术也被命名为“卡尔逊战术”。这部电影在二战中提高了美军士气,把工合口号传播到美国人当中。后来Gung Ho作为外来语被写进了美语词典,意为团结协作精神。

每当我们提起中国工合,就会首先想起工合的三位创建元勋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而卡尔逊对工合的贡献也是独特的,是他把Gung Ho一词的精神与意思传播到美国人中间。

宋庆龄与三位国际友人的革命友谊

张 钰

编者按：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2021年是宋庆龄逝世40周年，特刊发此文，以表达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



宋庆龄与秘书张钰(前坐左二)等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我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三十多年，其中在她身边工作十五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和她朝夕相处中，所见到所听到的，尤其是从她与国际友人交往中，亲聆她的教诲，受到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令人难忘！

不少西方朋友通过她的关系，逐步了解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在政治上、生活上关怀和鼓励他们，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他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在艰难的岁月中，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同生死共命运，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这里我仅就在宋庆龄身边所见她关心马海德、艾黎、斯诺三位国际友人的情景，作一回忆。

一、关心马海德

马海德1910年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革命。1936年夏经宋庆龄介绍去陕北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

70年代马海德住在北京，年老乏亲人照顾。宋主席就叫我写信给在张家口工作的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的单位，要求将幼马调回北京。

又叫我邀来《中国建设》杂志社领导到宋宅与马海德面谈，妥善安排幼马的工作。根据幼马的特长，安排为杂志社的摄影记者。从此，宋庆龄宴请外宾的摄影任务，就由幼马担任。宋庆龄不但关心幼马的成长，也关心他儿子小马骏的成长，时常送《儿童时代》刊

物给小马骏阅读。

从幼马到北京后,马海德每逢星期天就到宋宅打康乐棋,有时为宋庆龄矫正半导体收音机音量。因为马海德的住宅离宋宅不远,他还不时送来外国剪报,传递外国友人及国际形势等情况,帮助宋庆龄及时掌握了解世界动态。宋庆龄将住地河里打捞的鱼送给他,还送给他从远地带来的“苹果派”(以苹果为主制成的西点)。有时宴请外宾,总邀马海德作陪。他兴致勃勃,衣装笔挺,系上红领带,席上谈笑风生。他不止一次地向宋庆龄说:“我这红领带是您送给我的,是您引导我向左走的……”宋庆龄说他在交际场合是很活泼有趣的。为了使马海德更高兴,宋庆龄叫我上街买一条新的红领带给他,因为那条确已旧了。可是我跑遍了北京王府井、西单、友谊商店,却找不到一条合适的红领带而未买成。至今我感到十分遗憾,没有能完成这个使命。

一天,幼马打电话说,马海德得了癌症,宋庆龄立刻叫我去医院探病,马海德夫人苏菲满眼泪水,深为忧虑。马海德躺在床上,脸色灰白,但神态乐观并问宋庆龄好,请她放心。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马海德接到我的电话后,赶来探望。以后,每天清晨必来。忽然,有一天上楼探病后,他到我的工作室,面带喜色地说:“刚才我叫了一声‘Suzie!’她睁开眼看我了。”此时我正在伏案处理信件,立即住手听他的话和端详他的面部表情,心中暗喜:“宋庆龄脱险了!”我从马海德的表情看到他们间真诚的友情是很深很深的。

二、保护艾黎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到中国,先后结识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1933年结识宋庆龄和马海德。宋庆龄在艾黎寓所中所设的电台,与江西苏区及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1935

年10月的一个深夜,她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在艾黎家共同为红军的胜利举杯庆祝。1937年12月,艾黎亲自掩护宋庆龄瞒过虎视眈眈的宪兵、包探的监视,登上泊在江心开赴香港的海轮。宋庆龄曾深沉地说:“是路易?艾黎保护我到达船码头。”

解放后,艾黎定居北京。每逢艾黎生日,宋庆龄总要设宴为他祝寿。事先告诉我们,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艾黎在《自传》中写道:“1980年12月,她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和往常一样地活泼幽默,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病成这样。前一年,她在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的宴会上,讲起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发图强的现阶段,是她一生经历的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是的,那次宴会,宋庆龄谈到孙先生,眼神闪着光,她感到难忘的岁月,是如此的自豪。

在艾黎的《自传》中,还写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迹:“在‘文革’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这份证明信是宋庆龄用英文写的,要我译成中文。由她亲自签名叫我清晨送交艾黎,还千叮万嘱注意路上有没有人跟踪,要我早去早回,务必亲自交到艾黎手中。证明信上写道:“我从1933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一代……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那天,我把这份证明信紧紧地揣在怀里,从后海宋庆龄住所到对外友协,途中边走边

回头看,肯定没有“尾巴”跟踪,才走进友协。见到艾黎,孝手将证明信交给他。他感到万分高兴,一再表示对宋庆龄的感谢。要留我喝咖啡、吃花生米。我说:“谢谢,不行,我要马上回去,夫人在家等我回音呢?”回到后海,我仔细禀报了经过。宋庆龄说,“现在,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我保护艾黎,这是我的责任,因为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好事。”1986年,宋庆龄逝世五周年,在上海宋氏陵园举行宋庆龄像揭幕仪式,艾黎抱病参加。他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向现代的进步的妇女作一次致敬!艾黎称她:“一直很活跃,感到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努力继续为革命工作……她给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她像一株常绿的松柏,永远给人们以鼓舞。”

三、帮助斯诺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优秀的记者,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28年到达中国。一次,《纽约先驱论坛》的星期日杂志要他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文章,他以记者身份来采访了宋庆龄。宋庆龄开始不知斯诺底细,没有在莫利爱路(现香山路)家中接见,而是约在一家叫“巧克力店”的咖啡厅接见的。通过第一次接见后,她对斯诺的才华和为人才有所理解,就像欢迎朋友那样在家中经常接见他,给他谈中国的光明前途,逐渐为斯诺所接受。斯诺写道:“通过她,我了解到中国在最佳状态时的思想和情感。几年来,她总是把我介绍给那些将创造历史的年轻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后来我就跟她一起在成千上万的难民中组织合作社,为忍饥挨饿的孤儿提供住处,为医院提供设备……宋庆龄教育了我,使我了解了国民党,了解了孙中山及他心中的愿望,了解了她自己的宋氏家族和她拒绝跟她的家族一起帮助蒋介石统治的原

因;还了解了许多我从书本上永远不可能学到的事实。认识了宋庆龄使我明白了中国人民是能够剧烈地改革他们的国家,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的国家所处的低层地位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所决定的应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斯诺本人所写的这段话,爱泼斯坦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庆龄是斯诺的老师。”可见宋庆龄对斯诺帮助之大,而且帮助斯诺,就等于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争取了一个国际友人的支援。

1936年,斯诺能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完成他第一部惊人的世界名著《西行漫记》,就是宋庆龄帮助他成行的。因此斯诺在他出版的《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以敬仰和热烈之情,献给宋庆龄”。

斯诺和他的夫人是1970年被邀访华的美国朋友。宋庆龄在家中设宴约见,畅谈甚欢,非常高兴。事后一天早晨,她交给我一封英文信,叫我准时送交艾黎即转斯诺。她说:“有些事,只好请外国朋友谈。”可见此信的重要性。

这次访问期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斯诺登上天安门与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我暗中想这可能与中美关系有关。1972年,宋庆龄在为《中国建设》杂志6月号撰写英文稿《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写了1970年12月斯诺同毛主席进行长谈导致中美人民友好往来在中断二十多年之后恢复了。宋庆龄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恢复中美人民交往正是埃德加·斯诺毕生致力的事目标之一。”

1971年斯诺患了癌症,1972年2月15日不幸逝世。宋庆龄闻悉,通宵未睡。我和保姆陪着她。她端坐在书桌旁写唁电,是给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的。电文是:

“适才接到来电,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外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

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永葆常青。”

宋庆龄平时用英文写文章,下笔很快。唯有这份英文唁电却写了一个通宵。事后她告诉我:“由于拟电稿,勾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

很难下笔。”

斯诺逝世后,遗嘱要将一半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他的夫人照办了。安葬骨灰那天,宋庆龄写给我一张便条,让我代表她去一趟。便条上写道:“请代向洛伊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作者系宋庆龄秘书,题目为编者所加)

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位读者

“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中,陈列着一本埃德加·斯诺送给宋庆龄女士的193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它记录了斯诺的陕北之行,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成为铭刻于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

斯诺的记者生涯和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能够前往陕北,顺利采访“红色中国”,并成就《红星照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数年之后,斯诺在他的著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较具体地透露了“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当年斯诺的记者身份,使得他在上海认识了鲁迅、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尤其与宋庆龄的结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些会见接触中最主要的是我同孙夫人宋庆龄建立起来的友谊。”

斯诺通过与宋庆龄等的交往,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逐渐了解了在中国西北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有了去陕北苏区采访的想法。斯诺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求帮助,以便

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经宋庆龄联系,斯诺与外籍医生马海德获得了可以前往陕北考察的确切信息。1936年春末,宋庆龄派人给马海德送去一封信,约他到寓所面谈,并对他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此后,宋庆龄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就是后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的“王牧师”,在西安与他们接头并护送他们到陕北。”

于是,斯诺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根据采访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人第一次了解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人。这本名著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五版。书中开篇所叙述的携带用隐形墨水准备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帮助等经历,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便是宋庆龄。1938年该书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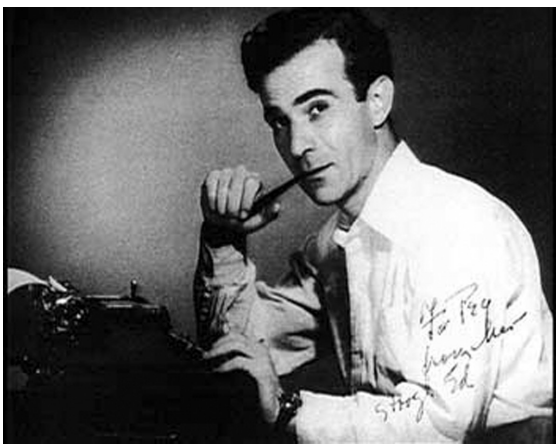
(稿件来源自《新民晚报》2016年10月06日,记者 方翔,有删节)

纪念埃德加·斯诺

宋庆龄

编者按 1931年在一次采访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了宋庆龄,宋庆龄鲜明的政治态度、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深深感染了他。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1936年春天,宋庆龄应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通过地下党组织,由王牧师(即董健吾)送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像我活着时那样……”

这是宋庆龄在埃德加·斯诺逝世后不久写的一篇纪念文章。



埃德加·斯诺终身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因患癌症,于2月15日溘然长逝。今年2月15日恰好是春节,也就是中国阴历大年初一。在这旧历新年的头几天,尼克松总统来到了中国。虽然在这次访问期间埃德加·斯诺不幸已离开人世,他毕生的事业却由此而告成功。

四十多年前,埃德加·斯诺22岁,刚从新闻学院毕业之后,就来到中国,如实报道了他

所看到的情况。一段期间,他为上海一家美国人办的周刊工作,并为美国一些刊物撰稿。1936年他勇敢地去了“河的彼岸”,去了解中国革命的新根据地,就是中国红军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才到达的根据地。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报道了他的发现:帝国主义的御用记者出于主观愿望,多次“可靠地”报道已经死去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共产党,虽然遭到惨重的牺牲,已使长征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过集体努力和斗争而前进的新路。

埃德加·斯诺在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的过程中,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北地区耳闻目睹的情况。他的这本书经过这么多年而今天仍然极有价值,成为纪念他的恰当的丰碑。他在西北会见了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领导人,他们同老百姓一样,住在黄土窑洞

里,他长时间地采访了毛主席,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从哲学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这对他都是很大的收获。



1936年,埃德加·斯诺(右)通过宋庆龄的协助赴陕北苏区采访。图为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途中

埃德加·斯诺在那些旅居在中国的年代里,一边在燕京大学任教,一边同中国人交朋友,学中文,并且认定寻求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在那期间他接触到一些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在那一阶段的作品,包括他翻译的当代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被人冷酷地称为“神秘莫测”的中国人能为外界所了解。

我和一些左翼的同志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以后去了香港。在那里埃德加·斯诺大力帮助我们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就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当时那是唯一的组织,通过它中国抗战的消息得以向国外报道、游击区得以提出要求并且得到医药用品和其他捐助的物资。我们克服极大的困难,把这些物资运到它们在内地的目的地。斯诺也是抗战期间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运动的热情的发起人之一,这些合作社帮助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克服他们所遭受的灾害和困苦。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赤色分子”的同情给他招致了很多敌人。在美国捕风捉影的政

治迫害时期,他遭到中伤,几乎没有一家报刊敢于登载他的文章。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他要清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解放后,埃德加·斯诺在1960、1964、1970年三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知疲倦地重游了多年前到过的一切地方,忠实地记录了他目睹的巨大变化,描述了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自力更生地进行着建设。

虽然当时斯诺并不知道,1970年12月他同毛主席进行的长谈导致了中美人民友好往来在中断20多年后的重新恢复。在那次谈话中,中国人民的领袖说,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进行对话。恢复中美人民交往正是埃德加·斯诺毕生致力的事业的目标之一。



埃德加·斯诺(左)与好友工业合作社支持者埃文斯·卡尔逊(右)合影

正当斯诺在写另一本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时,病魔无情地将他击倒。中国政府派了大夫和护士乘飞机前往帮助,给了他很大的安慰。斯诺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本文来源自《中国建设》1972年6月号)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

“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是1968年宋庆龄为艾黎所写证明信中的内容。在艾黎的心目中,宋庆龄“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激励着人们。”

一、初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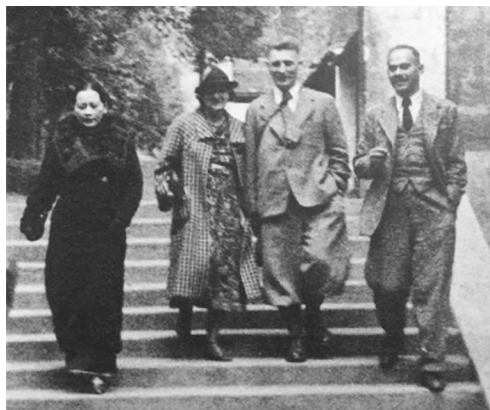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克莱斯特彻奇市以西的斯普林菲尔德镇,父亲曾当过教师、校长,母亲是英国移民,博学多识,家中7个子女(艾黎排行第三),几乎全都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艾黎早年参加新西兰远征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1927年4月,30岁的艾黎来到中国上海。此时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宋庆龄和艾黎的友谊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

1929年5月举行奉安大典,宋庆龄在南京迎接孙中山灵柩。据艾黎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宋庆龄,当时的他和一批上海童子军参加活动,站在道旁看着宋庆龄默默地走在队列前面。艾黎说:“在我看来,她是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

由于宋庆龄支持国际友人学习马列小组的活动,1933年,艾黎由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引领,来到宋庆龄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与宋庆龄相见。宋庆龄曾经对艾黎讲述1922年广州脱险的往事。

当时,宋庆龄通过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所用的电台就设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艾黎家中的阁楼上。长征胜利的消息传

来,宋庆龄与艾黎等友人一起举起香槟干杯庆祝。受宋庆龄的委托,艾黎1936年9月帮助红军运送活动经费,并和美国进步人士格兰尼奇一起在中国创办《中国呼声》。1937年12月23日,上海遭到日军侵略,宋庆龄乘坐艾黎雇来出租汽车,避过寓所附近的密探和日本特务前往外滩码头,一只手挽住艾黎结实的臂膀,登上一艘挂着外国旗的客轮安全离沪赴港。



1936年的宋庆龄(左一)与艾黎(右二)

二、共同抗战

抗战时期,中国大片国土沦丧,集中于沿海的很多工业毁于战火。为了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1937年11月,艾黎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等发起筹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艾黎在香港见到宋庆龄,在宋庆龄的支持下,他飞往武汉开始搞工合。1938年8月5日,工合在汉口成立,艾黎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到1942年7月,工合就发展到3000个,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月生产总值250万元。工合精神是“加油干、一起干”,后

来成为英文中的一个词汇“GUNG HO”。

从工合一开始筹备,宋庆龄就坚决支持。1939年1月,她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1939年末,宋庆龄在香港ZBW电台作广播讲演,指出工合“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无价之宝。”1940年,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和成都时,总是对工合予以支持。1941年7至8月,宋庆龄发起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等活动,从海外筹募捐款和物资支援工合。

到了1942年,国民党对工合越来越加以控制,把开创工合的民主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宋庆龄非常担心,但是她坚信艾黎“有勇气坚持下去”。果不其然,艾黎没有意志消沉。为培训工合管理干部和技术指导的人才,1942年艾黎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3年底迁到了甘肃山丹。这所学校招收农村贫苦儿童入学,解放大西北时,学校师生还整修安装30多辆汽车运载人民解放军收回玉门油矿并抢救伤兵。

三、建国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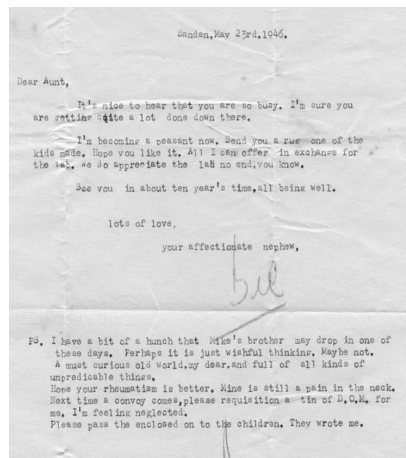
1949年,宋庆龄当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由于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她与艾黎之间友谊越来越深厚。1952年10月,宋庆龄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37个国家的600多位代表参加。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执行主席致开幕词,指出:“和平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艾黎担任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也在会上讲话。此后,艾黎经常参加维护世界和平的会议并发表演讲。

艾黎多次在北京迎接新西兰人民到访,新西兰总理、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都曾率团看望他。他是个多产的作家,经常到中国各地搜集材料写文章和诗,还创作戏剧、翻译诗歌,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他多次把自

己写的书赠给宋庆龄。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曾刊登艾黎的文章。

宋庆龄过生日时,艾黎送上一副对联,写的是“福如东海爱人民,寿比南山友国际”,横批一个“寿”字。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后海寓所为艾黎庆祝生日,艾黎参加完生日宴会后非常感动,回到家后写信表示感谢。

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始终把艾黎当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朋友关怀和慰问。1977年艾黎80寿辰,邓小平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习仲勋同志非常关心艾黎,多次前去看望,出席艾黎诞辰庆祝活动。



1946年5月23日,路易·艾黎致函宋庆龄,感谢她对培黎学校实验室的资助(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2015年7月22日,时任新西兰总督杰里·迈特帕里及夫人贾妮在应邀访问中国期间参访宋庆龄故居。故居为此特别展出了宋庆龄珍藏的艾黎亲笔信等23件珍贵文物,总督夫妇欣然写下留言:“宋庆龄与艾黎的友谊是当代中新关系的基础”。

(本文来源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管理中心网站2018.12.25)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对工业合作运动的支持

李贵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并建立了一批帮助难民和伤残军人就业,制造军需民用产品的合作社,有力支援了敌后抗战,由此形成闻名中外的工业合作运动。中国银行也以金融之力,积极支持了这一运动。

一、战时工业合作运动的兴起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沿海城市相继沦陷,80%的现代工业遭到毁灭性破坏,海运又被日军封锁,市场上日用品供给极度缺乏,严重影响军需民用,急需增加生产;与此同时,大批的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背井离乡不断涌入后方,至少有60万人流落在街头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如能充分利用当地原料、条件,并且最有效的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手工生产,以生产代替救济,既有利于增加军用民需,又可安定后方,壮大抗战力量。

在此情况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夫妇、上海工部局新西兰籍工业社会问题专家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上海爱国人士徐新六、胡愈之、卢广绵等十一人,商量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在内地乡村组织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成立生产合作社,采用小工业、手工业方式生产日用品。既支援抗战、改善民生,还可以发展内地工业。艾黎给这项意义重大的运动起了一个好记易懂的名字——“工合”,即“工业合作”的简称,也是“共同工作”的意思。

艾黎等人起草的工合设计方案,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及宋氏家族高度肯定。在宋庆龄的协调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帮助下,工合的计划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大力支持。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后迁往重庆,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机关是协会的理事会,由行

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庆龄任名誉理事长,共产党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参加了理事会。路易·艾黎被任命为工合技术顾问。

总会下设五个办事处,推动全国的工业合作运动。西北办事处设于宝鸡(分管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西南办事处设于邵阳(分管湖南、广西、贵州),东南办事处设于赣县(分管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广东),川康办事处设在重庆,云南办事处设于昆明。工合办事处下设事务所,组建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

二、中国银行对工业合作运动的支持

工业合作运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金。为了募集资金,1939年7月,宋庆龄、何明华(英籍香港大主教)、斯诺、艾黎、普律德(美国友人)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面向海外华侨、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进步社团以及国际友人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其次是国内银行提供的工业合作贷款,还有就是合作社社员缴纳的股金。

作为当年的四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发挥自身优势,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了工合运动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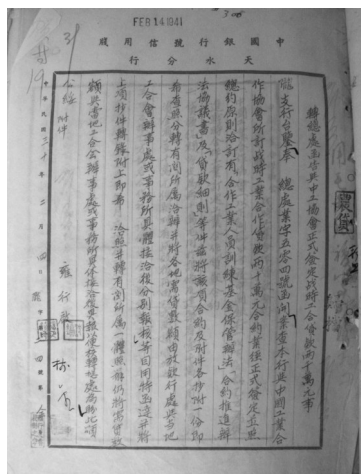
(一)发放工业合作贷款,贷款区域达9省36县。中国银行经办的工业合作贷款,一直隶属于农贷部门,有些还是由农贷人员兼办的。1939年,中行开始在四川试办工合贷款,并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区域内,通过贷款协助该处开展工作,当年贷放约370万元。1940年,扩大到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贷出236万元,贷款余额243万元。当时各省贷款,都由各地分支行直接与工合协会事务所分别洽办。

1941年度,中行办理工合贷款的区域扩大为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浙江、陕西、甘肃、河南等9省、36县,贷放金额480万

元,收回170万元,年底余额553万元。1942年8月底止贷款区域与上年相同,贷出金额178万元,收回100万元,余额631万元。

为增进工合贷款效果,中行还在重庆等地招考一批工贷专职人员,集中训练后分配各地担任贷款指导工作。对于后方急需的机械、化工、纺织、印刷等类工业的增产,予以特别重视,结合当地原有基础予以贷款扶持,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签订战时工业合作贷款合约,贷款最多可达七成。1940年11月18日,中国银行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签订了战时工业合作贷款合约。规定贷款总额2000万元,其中半数用于设备及建筑,半数用于流动资金。合作社所需资金以自筹三成以上,中行贷款七成以下为原则,必要时如经工合会担保偿还,还可以加贷二到三成。为了推动战时合作工业的发展,双方还共同拟订了《战时工业合作贷款合约推进办法协议书》,中行制订了《对工业合作社贷款细则》。贷款区域以中行经办农贷的区域为原则,贷款对象以遵守工合会辅导并经依法登记的合作社为限;对贷款用途,贷款额度及贷款期限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有一份档案记述了当年中国银行天水分行指示兰州支行做好工合贷款的史实。1941年3月24日,天水分行向兰州支行发出《函转

工合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函洽战时工合贷款分配甘省数额请与该会当地处所接洽具报由》。

文中写道：“陇支行台鉴 前奉总处函示，本行已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订立战时工业合作贷款总合约二千万元，其各地需款数额由放款行处与当地工合会办事处或事务所具体接洽后分别报核一节，已于敝二四号函达查照在案。兹准该会西北区办事处函称：奉该会电示，上项贷款分配于甘肃省二百五十万元，嘱转知尊处即予照办等情。

查该会分配于甘省之二百五十万元贷款额度，兹准该会天水事务所来商，拟分配于天水、秦安、甘谷、徽县等四县，共一百二十五万元，除以面允外，至其余数额一百二十五万元，应由尊处及所属各处分别与各当地工合办事处或事务所接洽分配。……”

(三)提供训练基金，采用四步法培训专业人才。中行为配合及支持合作工业的发展，还提供了一笔训练基金，作为培训合作工业管理及技术人员之用。基金来源从本行工合贷款的利息收入中拨出 1/8 另户存储，基金的保管及支配由双方共同组织合作工业人员训练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

发展工合运动，需要合格的工业贷款人才做基础。中国银行主办的《中行农讯》1941 年第 6 期《本行工贷人员之训练》一文，记述了当年中国银行精心培训工贷人员的重要史实。

第一步是工厂实习。化学专业人员分制革、制纸、陶器、农产加工四部分，分别派往制革厂、制纸厂、陶瓷厂、酒精厂及糖厂实习；机械专业人员派往纱厂实习；工厂管理及会计人员派赴某纱厂及重庆分行办事处实习。实习时间三个月，要求学员在技术方面，以亲手完成全部工作程序，能单独制造成品为主要目标。管理会计人员方面，以切实参加会计工作，能办简单决算，并熟习全厂管理事项为目标。

要求学员“实习完成之成品，应经委托工厂评定等级，于实习期满后送交本行作为成绩。”“实习人员，应于每周周末将该周实习经过，拟具报告，呈送本行以资考核。”

第二步是课堂教学。担任工贷人员培训的讲师可谓阵容豪华。总管理处安排副总稽核霍宝树主讲“本行沿革及工业贷款之演进”，西安分行经理束士方主讲“工厂之经营”，总管理处会计室主任姚崧龄主讲“工厂内部之审核”，蔡公椿稽核讲“科学管理”，陶桓棻副稽核主讲“本行办理农工贷之经过与意义”，还有一些专家主讲“工业人才之训练与实务”、“制革工业”、“工合运动概况”、“目前后方工业之危机”、“青年应如何从事工业”、“工合运动之检讨”、“检查工厂之要点”、“创设工厂之要点”、“中国之纺纱工业”等专题。

第三步是参观工厂。集中听讲完毕后，即行组织学员赴机器厂、造船厂、制革厂、造纸厂、化学厂、制药厂、榨油厂、钢铁厂、动力油料厂、水泥厂、酒精厂、陶瓷厂等参观，参观归来即书写报告。

第四步是赴各工合社实习，开展专案研究讨论与设计。学员要将实习参观访问所得之材料及重庆分行办理工贷之材料分别加以研究并设计。

三、工合运动对抗战胜利功不可没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的合作社，约半数在西北区、东南区。包括纺织、衣被、制革、五金、矿冶、军工等十几个门类。产品主要供应军需民用，其中军毯一项，先后完成 193.5 万条，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各区设有联合社，开展供销业务。据 1942 年底统计，设有 72 个工合事务所，近 3000 个工合社，社员 3 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 2500 万元，社员股金 600 万元，工业合作协会和银行对工合社的贷款约 8000 万元。曾先后接受美英等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

体援助款项约500万美元。



西北工合最活跃,贡献也最大,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工合产品的半数,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西北工合下属有机械、铸造、铁器、木器、竹器、制革、毛纺、纺纱、织布、印染、肥皂、毛巾、缝纫、印刷、制鞋、针织、制毯、饮食等生产合作社,能生产军需和民用产品,极大缓解了产品供求矛盾。1939年,宋庆龄委托西北工合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制作10万件棉衣。同年8月,中国工合同国民党军政军需局签订了第一批承制军用毛毯40万条的合同,西北办事处承担30万条,1940年完成后运往抗日前线。1941年至1945年,西北工合连续签订了第二、三、四批合同,生产军用毛毯80万条。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西北工合安置了数以万计的失业工人和难民。西北工合还充当了国际社会援助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间的重要桥梁。国际捐赠一般是由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交付西北工合,再由西北工合交给延安事务所,最后由延安事务所交给陕甘宁边区政府。

“工合”运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1939年至1940年,路易·艾黎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工合”事业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同、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迁至上海,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回香港。各地工合社在抗战后期逐渐减少,1947年仅存300余个。由于工业合作社一般规模很小,基础薄弱,缺少经营管理人才,专门技术指导也不足,而且物价波动剧烈,使合作社经营举步维艰,工业合作贷款的经济效益不很理想,但是社会效益十分显著。1951年,工合并入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1952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解散。1987年,在路易·艾黎的倡导下,该委员会恢复活动,并积极支持探索新时期中国合作事业。

四、“工合运动”开创于中国,传播到了世界

1942年,海伦·斯诺通过宋庆龄,给尼赫鲁送去一本《中国为民主奠基》,尼赫鲁以这本书为教材,在印度建起了50,000个工业合作社,开始了印度的工业“革命”。伊文思·卡尔逊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用“工合”精神训练他的队员,并把“工合”二字作为他们的战斗口号,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赢得了第一个胜利。50年代初,把海军陆战队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片名就是《工合!》。于是,“工合”成为美国人的口头语,进入了英语词典。战后,工业合作社在亚洲、埃及、欧美纷纷建立。上世纪70年代,全球“工合”会员总数排位,印度位列第一,美国第二,苏联第三。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支持工合运动的历史昭示我们,银行在组织生产要素、扩大市场供给、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中国金融业应当以史为鉴,不忘初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无愧于前人,无负于来者。

(作者系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高级经理,近年致力于金融抗战史研究,已发表研究成果40多篇)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前言

路易·艾黎(陈向东译)

编者按:艾黎1949年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一书所写前言中,对山丹培黎学校合作办学理念作了详细的介绍和阐释,是研究培黎教育的珍贵史料。本文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陈向东提供和翻译,特此致谢并分享。

FOREWORD

Rewi Alley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compile a written repor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his year, so we have chosen to present these photographs as the report of the Shantan Bailie School for 1949, hoping that they will indicate our progress to those who have followed our work with interest, and be an adequate introduction to those who are hearing about the Bailie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Shantan is in a poor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district in the panhandle of Kansu, in north-west China. Since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ll be in the poor villages of China's hinterland, where resources lie untapped, Shantan was chosen as a good place to set up an experimental and training centre. Here, since the fall of 1944, boys have been trained and methods adapted which will give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of the future some of the men and machines that it will need. Here, the lessons learn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Gung Ho' at the st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ave been applied to preparation for fu-

ture 'Gung Ho' development. Here, we try to link training with production in every kind of village industry.

Co-operative training, of course, should be a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operatives themselves; but 'Gung Ho' co-operatives for the past decade have been harried by war, by inflation and lack of capital, so that they have been denied the economic power necessary to support such work. It has been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friend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this work has been continued. The C.I.O.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nt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tud sheep. The Council of Relief Organizations in New Zealand has sent technicians: a doctor and his wife to staff the hospital provided by the Womens' Co-operative Guild in London. C.O.R.S.O. has also, during the past year, shouldered a great part of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k, as well as sending in clothing, tools from New Zealand miners, and other valuable materials. INDUSCO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ed with its loyal and able assistance in both money and materials. The 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 Fund, and the Anglo-Chines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ociety,

have both helped with money and with the training of two boys sent to England. The Foster Parents' Plan for War Children in China has help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irty-six trainee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ervice has help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or various projects, and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 Friends' Service Unit has assisted with personnel and transport. In all, quite a co-operative endeavour; and one for which we here are most grateful. There are more than five hundred people in this community.

There are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students and the rest are workers and a training staff that numbers twenty Chinese and twelve foreigners. All of the Chinese staff are from North China, and of the foreign assistants, seven are from New Zealand, two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e from England, one from Germany and one from Austria. The majority of the trainees come from Kansu, of which seventeen hsien are represented.

The next biggest is the Honao group, which numbers about one fourth of the total. There are seventeen provinces represented in the school. The twelve girl students, mostly from Honan, are chiefly engaged in textile work.

Class work stresses subjects that will be most useful to a co-operative technician-machine drawing, mathematics, book-keeping, as well as usual Chinese school subjects. English is taught in order to give the technician ability to acquire more knowledge from text books when he has left the school. Four of the eight classes work in the mornings, and four in the afternoons, so that both practical and class work keep going continuous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Sundays and excursions, there is no break in practical work

during the year, though class work stops for two or three weeks at the end of each of the two terms. Technical training is done in twenty seven training divisions. As one of the aims of 'Gung Ho' is to integrate the agricultural, the pastoral and the industrial,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school farms, with their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work.

During the year, the Ministry of Water Conservancy has assisted by putting in a diversion scheme, which gives the school water for 3,000 mou of its 10,000 mou of waste steppe land. All laterals on the school section have been dug by staff and boys during the year, and much terracing and other essential manual labour completed by them also. The pastoral work has been greatly assisted by the New Zealand and Indian stud sheep brought in.

It is hoped that the school will support itself one day, especially when its coal pits and wool textile machinery are in full production and when more steppe land has been brought under cultivation.

New seeds offer a way of bettering conditions locally as do new ways of using such products as sugar beet, not previously grown in the area.

A school which aims to produce able, creative men and women should carry out much experimental work, from which there can be no income at all. Trainees of ages ranging from thirteen to twenty-four, have a widely differing ability to produce; and most of our trainee group is in its first and second year only. There must be time for recreation—boys' are not fully-formed people and will make many mistakes which would be

the despair of many a technician with no patience or real interest in the boys themselves.

Cooperation is learnt best by liv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Confidence in the group is helped greatly by the good hospital facilities provided, by its collective ability to better its own livelihood—making its own clothing, electricity and growing its own food. The human problems that have to be met are many and varie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m, and the fact that trainees have grown up in this kind of organisation, make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p system which will stand them in good stead in a cooperative group throughout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a technicians life. Some of the boys who are coming now to their eighth year of Gung Ho training,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do creative work infinitely better than most of the human material we possessed whe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began.

Work on the farms over the past year has prevented work on the iron smelting for machine shop material from being started. Produc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necessary, as remittance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t the time these lines are being written, it is necessary to send from Chinese Central Asia to the south coast of China to bring in money needed. Banks will not take remittances, and notes are not being used.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s yet do not permit supplies being brought in easily. The element of struggle in everything we do, has always been with us here, and we expect it will stay with us. It helps to mould us into a group devoted to one thing—better livelihood for the Chinese villager.

前言

路易·艾黎（陈向东译）

今年有可能编辑一部兼有中文和英文的报告,因此我们选择提供这些照片作为1949年山丹培黎学校的报告,希望这些照片能为那些怀着极大兴趣跟随我们工作的人来展现我们的进步和发展,也可以为那些第一次听到培黎学校的人们提供一种学校发展的情况介绍。

山丹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一个农业和牧业都很落后和贫穷的地区。由于工业合作运动的未来将会在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得到发展,那里的各种资源都未被开发和利用,所以山丹应当是一个建设工合实验和作培训中心的好地方。这里,自从1944年,一直在用适宜的方法来培训学校的孩子们,并会为工合运动提供一个未来的家,这个家拥有学校所需要的劳动者及各种机器。也是在这里,自从抗日战争初期“Gung Ho”奠基以来,我们也逐渐积累了各种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正在持续得到应用,为“Gung Ho”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这里,我们一直尝试在各种各样的乡村工业中将培训与生产结合起来。

合作性质的培训,当然应当是合作社自己责任的一部分,但以往多年“Gung Ho”合作社的发展却是起于战争应急,饱受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压力,但那些我们迫切需要的经济大亨们却常把我们拒之门外。反倒是美国的CIO组织送给我们电气设备,印度政府送给我们种羊。新西兰的“救济理事会组织(Council of Relief Organization)”派来了技术人员:一位医生和他的夫人,参加到我们的医院职员队伍中,而这所医院也是由伦敦的“妇女合作行会(Women's Co-operative Guild)”资助的。C.

O.R.S.O 也曾过去的数年中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同时也曾从新西兰的矿工那里收集来衣物和各类工具,以及其他多种很有价值的物品,送给我们。美国的 INDUSCO 公司一直执着热忱地为我们提供资金和物品的支持。英国“扶助中国联合基金(The 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 Fund)”,以及“盈格鲁-中国合作发展协会(the Anglo-Chines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ociety)”都在资金和培训(接受两个年轻人在英国学习)方面帮助我们。面向中国战争弃儿的“福斯特父母计划(The Foster Parents' Plan for War Children in China)”扶持了我们的36位学生。“农产业服务社(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ervice)”为多种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提供了技术援助。“良友服务社(The Friends' Service Unit)”在人事工作和运输方面也帮助我们。总之,看起来真是一个大家合作的努力成果,对此我们衷心感谢!

我们这个群体拥有大约500余人。包括350名学生,其余是工人和培训教员,其中有20名中国教师和12名外国人。所有中国人都来自中国北方,而在外国助手里面,七位来自新西兰,两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德国,一位来自奥地利。

大部分学生来自甘肃,其中17位来自县,其次是河南学生,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总体上人员大约来自中国的十七个省。学生里有12位女学生,主要来自河南,大多从事纺织工作。

课堂上的学习主要注重那些对合作社技术人员最有用的科目,例如机械制图、数学、记账,以及其他有用的中国学校课程。学校也教英语,以使学生离开学校以后,仍具有从教科书上获得知识的能力。八个班级中有四个是在上午工作,其余下午工作,这样生产实践和

课堂学习可以持续交融。周日或有其他事务时是例外,其余时间全年都是这样,生产工作没有间断。当然,一年之间有两个学期,每个学期最后两到三周是不上课的。技术培训覆盖27个不同的生产组。这些工作是基于“Gung Ho”的一个目标,把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学生有相当多的精力会放在学校的农场上,从事他们的农业和畜牧业工作。

在整个学习期间,政府的水利部也帮助学校开展工作和生产计划,为10000亩未开垦的土地上提供覆盖3000亩的水浇资源。所有土地里的测量和开垦都是由职员们和学生们来做的,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土壤耕作和基本的田间劳作。而畜牧业则主要通过由新西兰和印度引进的种羊来开展。

我们希望有一天学校能够自我支撑,特别当我们的煤矿和纺织机器达到满负荷生产,更多的荒地得到开垦和种植时,应当能够实现。

我们种植新类型的种子会为当地提供更好的条件,同样,以新的生产方式也会改变当地的条件,例如甜菜,这里以前就没有这种蔬菜。

一所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有创造力的男女学生应当开展更多的实验,而这类实验是不能带来任何薪水和收入的。我们的学生的年纪从13岁到24岁,能力差别很大,而大多数学生还仅仅处在他们的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因而我们必须允许他们有各种业余爱好——孩子们并非已经成型的成年人,他们会犯很多错误,那些对这些孩子毫无耐心,也没有真正兴趣的技术人员,他们会觉得很崩溃。

通过一起生活和工作来学习合作是最好的方式。小组成员通过一种非常好的亲密无间的氛围来帮助建立彼此的信心,也靠这种集体的能力来更好改善自己的生活——制作自己的衣服、自己发电、培育自己的田间食物,等

等。人类成长遇到的问题非常多,而且各不相同。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学生们在这样的组织中间成长起来的事实,都会帮助大家理解这样的集体形成的体系的作用,这种体系会支撑他们在成为技术人才的整个形成阶段都处于有利的地位。现在有些学生已经在这里待到“Gung Ho”培训的第八年了,他们正在负起责任,做着创造性的工作,比起我们初创工业合作事业的年代那种人力资源要好得多了。

农场里的工作有时会对某些生产形成干扰,例如为制造机器车间提供材料的炼铁生产滞后等。但生产工作还是越来越必要,因为学校的经费和补助越来越困难。就在我打下这

几行字的时候,我们正要从中国中部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出一些产品货物,以便获得必要的资金。银行通常不会提供援助,纸币现金也不能用,仅仅靠纸上的文字往来交流并不能轻易的获得所需供应。我们这里所作的每件事里需要去斗争的故事可以说随处可见,我们也随时期待这样的事还会发生。但这样倒促使我们这个组织团结一心,就集中作一件事:为中国乡村的更好生活而努力。

注:本译文用“Gung He”表示正式的”工合“组织,凡是原文“Gung He”的地方都保留原文形式。

(译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宝鸡工合运动

抗战爆发后,宝鸡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便捷的交通条件等因素,成为工合运动发展的理想之地。同时,宝鸡邻近陕甘宁边区,便于支援边区的生产生活和抗战斗争。因此,工合总会成立后,根据周恩来和博古的建议,路易·艾黎他们便开始筹划在当时陇海铁路的西端终点站宝鸡成立办事处。

1938年8月23日,受中国工合总会派遣,卢广绵同工合指导员、上海技工孙夏威来到宝鸡。在他们的积极动员和大力支持下,8月26日,由7名铁匠联合成立了“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这是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以来创建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并随即在原宝鸡县城西门里路南(今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这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建立的第一个派出机构。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成立后,将大批沦陷区流落到后方的难民和失业者组织起来,积极创办各类企业,开展生产自救,解决了3万多产业工人和难民的吃饭问题,发展和保护了宝鸡地方民族工业。因处在战争的特殊时期,西北

工合的各类企业紧紧围绕军需民用,积极开展生产,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抗战期间,西北工合办事处共先后建立了宝鸡、凤翔、陇县、双石铺等18个事务所、6个指导站,500多个合作社,业务遍及纺织、服装、矿冶、化学、机械、五金、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等几大类,产品多达一百余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经济运动,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作为西北工合运动的中心,宝鸡工合承担了繁重的军需供应任务。仅1939年12月,工合宝鸡事务所所属合作社生产供应的军毯就达5万多条、军大衣3.6万件,市值近100万元。同年,受宋庆龄委托制作了10万件棉衣送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前方抗日将士。当时,抗日前线军需的毛毯中,有80%是由宝鸡地区工合组织生产的,受到了前线后方的交口称赞。宝鸡工合成为当时抗日前线军需物资供给的重要生产基地。因此,宝鸡也被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的埃德加·斯诺称为中国的“工合城”。

稿件来源自宝鸡新闻网2021.3.29)

编者按：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晚，艾黎前往宋庆龄寓所瞻仰遗容，同时参加治丧委员会为她守灵。在宋庆龄逝世后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艾黎思及往事，心潮难平，在两天内写下了五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宋庆龄，以寄托他的哀思，这是其中的一首诗。谨以此诗纪念宋庆龄逝世40周年。

悼宋庆龄

漫长的战斗正临近尾声，
另一位战士却逐渐消失，
沿着她珍爱的祖国那一些
山山岭岭，消失于蓝色的
云天；虽然遭受着病痛的袭击，
她看去也并不衰老，虽然
年事渐高，她的战斗
却一直那么紧迫；
那天早晨黎明之前离开她的家，
那里是这样安静，两扇朱漆大门
慢慢地开启，开向那边
一排柳树哭泣着把枝叶
向海面低垂，激起海岸下
一圈圈涟漪。我们走过夜雨浇湿的
还没有行人的街巷，我想着
她一生是怎样探索并献出一切，
不为了其它目的，除开
她心爱的理想的实现；自从在
广州，她藏身于被军网的兵士
枪杀的人们里面，她的革命活动
一直继续不断；多少年

她崇高地坚定地用孙逸仙的
精神，进行不倦的斗争；
一位花朵般优美
钢铁样坚强的
妇女，实现了一个计划，
便微笑着进行第二个，
为了她的人民的事业。
自从患病，到她
离开我们，时间
太短促了，才只有很少
宝贵的日子，她便已经仙逝；我们这些
爱她的人们感受到
每当一位好同志亡故时
总有的的一种空虚。
在她的祖国
人们都在为她举哀，
全世界妇女也在痛悼
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的
伙伴，如今离开了她们。

1981年5月30日，北京。
(陈敬容 译)

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及时代价值

米江霞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4日给国际友人亲属复信中强调：“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希望你们以亲人为榜样，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路易·艾黎“是一个寓伟大于平凡的人，一个在淳朴中蕴藏着非凡魅力”的国际友人，他的伟大与平凡，淳朴与非凡魅力无不诠释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无不浸透着他深厚的生命情怀。本文从生命情怀的角度阐述路易·艾黎精神及伟大人格，对艾黎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

生命是宇宙的奇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生命更是这“灵光”的根基。人类一路走来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自己，完成了自身，实现着万物之灵的努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的精神可贵在于他精神的超越性，超越个体、种族、国家，其精神超越的根基是对人类本质的正确认识、认同，其外在表现是对人类个体生命和类存在的敬畏。正因为精神的超越性才成就了他行为的超越性，他的行为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界限，深入到了人类生命的本质。

一、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

诺贝尔曾经说过：“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的缅怀。”生命是世界上最神奇的际遇，特别是人的生命。路易·艾黎小时候受到家庭的熏陶，青年时代受

好奇心的驱使来到中国，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洗礼中，造就了他珍视生命、追求真理、勇于实践、英勇顽强的人格品质，他一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追求。

（一）珍视生命、成全生命是他生命情怀的基础

初到上海，工厂督查工作的经历让他饱受目睹各种生命遭受无情摧残的痛苦。他在自传中写到：“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个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上海的工业安全情况让艾黎感到震撼，他非常担心这些孩子们。他建议工部局工业科在缫丝厂建立一套总煮沸系统，但工厂方面以价格高为理由拒绝了。后来，艾黎和同事们在工厂里找到了从日本抄袭来的总沸煮系统，成本相对低廉。他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租界内的所有缫丝厂内推广使用。

艾黎发现由于工厂没有保护措施，导致了童工们金属中毒的事件。他看到孩子们在无盖的铬钢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为了帮助他们，艾黎等人要求上海的各家医院提交他们处理的工业事故报表，然后工业科根据这些报表作调查。艾黎甚至

去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收集童工的尿液标本,检测其中铅的含量,想办法为他们医治。

年轻女工的生存状态更让艾黎揪心。以上海纱厂盛行的包身工制度为例,纱厂的女工大多是从农村地区买来的未成年少女,控制她们的包工头是青帮成员,与开妓院的地痞流氓联系密切。包工头除了从她们身上榨取利润之外,还会把一些面貌姣好的女工送去福州路当妓女,如此等等。

(二)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他生命情怀的关键和核心

战争是生命的最大威胁,特别是侵略战争,反对战争、阻止战争、尽早结束战争是对生命的敬重和尊重。艾黎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战士,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和平。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边,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收养贫苦孩子,一生未婚却被许多孩子称为父亲;他注重战争中的经济支持问题,创办工合组织;他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问题,在各地创办培黎学校,使青年人用劳动创造实现自己和民族的自立自强。

和平年代,他为世界和平和消除战争积极奔走。1952年,艾黎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艾黎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他说“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是永远无法切断的。”

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他用一生的不懈奋斗诉说着和平的价值和意义,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正如

邓小平同志给他的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三)促进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他生命情怀的目标和归宿

艾黎用不懈奋斗的一生诠释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模样。他六十年如一日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改善中国经济状况不停奔走,为中国劳工生存条件的改善四处周旋,为中国青少年的劳动技能教育呕心沥血。

他也用自己对待生命热烈而奔放的态度感染着周围的人,为他人实现生命价值和意义不断创造条件。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世了,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辉煌灿烂。从他亲自为战友乔治·何克选择的碑文中能够感受到生命绚丽的色彩。面对人怎样才能富有的追问,艾黎在《人怎样才能富有》一诗中写道:人的一生何等短暂/就像一阵风一掠而过/有的人留下万贯家财/让懒散的儿孙恣意挥霍/而真正的富有/应该是为同代人的幸福/竭尽所能/除此还能理解成什么?

二、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的践行

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是纯粹的,更是现实的,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无不浸透着他博大而又深沉的生命情怀。

(一)关注弱势群体,竭力扶困助贫。

1942年河南遭受旱灾和蝗灾,大批难民逃荒到陕西宝鸡。艾黎将几名年纪比较小的难民带到了双石铺培黎学校。在此之前,双石铺培黎学校已经安置了116名战争难童。11号召失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救亡,解决生活困难,支援抗日战争。

1942年以后,艾黎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

(二)竭尽所能为劳动者创造劳动条件和机会,使劳动者通过掌握技能的劳动创造达到自立自强。

他生命情怀的落实不仅仅靠救济,更重要的是靠劳动,靠对穷苦人民劳动意识的启蒙、劳动能力的培育和劳动条件的开创。例如:工业合作社的工合运动,尽管最后走向衰落,但是没有阻止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理想的步伐。组建工合组织,提出“努力干,一起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善于分析,勇于创造,为人民多做好事”。职业教育建设:来到山丹的第二天,艾黎就把大家带到了发塔寺,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在这儿创造我们的未来。”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工合不仅是一个生产运动,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运动。”“中国工业合作,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与民主政治的教育。”这是宋庆龄对“工合”的高度评价,更是对艾黎创新“工合”事业的高度评价。

(三)投身教育、创办教育机构,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致力于通过教育提升人的劳动能力,提升个体生命的质量,促使生命价值的实现。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艾黎先后在中国创办了六所培黎学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培黎学校其名为“培黎”,意为“为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正如其校名的寓意,培黎学校不仅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也提升了工农子弟的劳动能力,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回山丹》:“非所料,年深岁改,故人还在。……山丹啊山丹,你怎么不使我往事萦心田,忆海翻波澜。往昔斗争已作烟云散,看今朝后继有人上了四坝滩。……昔日荒一片,今日好耕田。”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手脑并用、创造分

析、联系实际。”

他在1980年拟定的遗嘱中写道:“遗体火化后,希将我的骨灰先放一放,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我收藏的艺术品剩余部分交给山丹文化馆的朋友们,我账上结余的钱也全数交给他们用以支付运输和陈列费用。”

(四)致力于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

三、路易·艾黎生命情怀的时代价值

艾黎一生用不懈追求、执着奉献的实践诠释了他的生命情怀,他的生命情怀是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路易·艾黎的生命情怀及其实践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实现具有时代价值。

(一)警示我们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艾黎生命情怀具有强大生命力,对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生命的价值在于充分的实现其意义,而有意义的人生需要在劳动创造中实现。弘扬艾黎生命情怀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学会把个人的生命根植于报效国家、服务人民,把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为人生努力志向和精神追求;把个人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各自在平凡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实干奋进、奉献社会上;追求宽广人文胸怀、不为物欲所惑,不为色欲所诱,不为浮躁所动,不为名利所累,志存高远、坚韧不拔地为实现“国家之梦”、“民族之梦”、“人民之梦”而扎实奋斗。

(二)“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为新时代攻坚克难、团结奋进提供有效借鉴。生命价值的实现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个人发展方

面的合作精神；二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和谐精神；三是国际合作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

（三）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实现要靠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创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

说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今天我们要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坐而论道是不可取的，坐享其成更不可能，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崇尚劳动创造、热爱劳动创造、勇于劳动创造的良好氛围，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变成现实。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艾黎同志珍爱生命、勇敢战斗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生命情怀定将启迪一代又一代青年不懈奋斗，不断续写美好的人生华章。

（作者系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我和路易·艾黎

李岷阳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任何时候，劳动都是神圣的，高尚的。

路易·艾黎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实践，总结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创办山丹培黎学校的不懈探索中，也体现在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他提倡青少年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还联想到未来的教育应当成为半工半读的教育，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培养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促进社会的前进。

艾黎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深刻地启发了我，特别是他写的《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详细地记述了他创办山丹培黎学校的经过，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迫切需要见到本人。于是，我找到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以崇敬的心情说明，艾黎的这本书对改革中国教育很重要，因而我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甘肃出版。经王炳南会长介绍，我拜望了路易·艾黎，征求他老人家的

意见。他首次，很客气，同意我们将他的书译成中文，在他的第二故乡甘肃出版。艾黎很高兴地为该书写了前言，并说译文可繁可简，只要把他的教育思想突出就行了。他答复得如此明快简要，而且很客气，当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这对别人是很少有的。从此，我便频繁来往他家，直到该书出版。在庆贺艾老90华诞前，我去拜望艾老为他贺寿。进到屋内时，他从卫生间刚出来，拄着拐杖，身体不能保持平衡，我扶他走到座位上，他低着头说：“欢迎您，我已是一个破老头子了……”，我心中很难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住在医院，见到我来，双手高举想和我拥抱，我低下头，亲吻他，说不出话来。离开时，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当他90岁时，仍然想到他的第二故乡山丹去，直到他病重的时候仍念念不忘，要求在他死后，把骨灰撒在山丹四坝滩的原野上。

（本文节选自《培黎之光·序言》，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中国抗战中的乔治·何克

况 鹰

在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城南，有一座西式风格的陵园，里面长眠着两位国际友人。一位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英国友人乔治·何克。他们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创始人。

本文介绍英国友人乔治·何克短暂而壮丽的一生。

周游世界的英国青年

乔治·何克，1915 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何克的姨妈穆里尔·莱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何克 6 岁起开始接受家庭教师辅导，10 岁时曾随姐姐在瑞士一所国际学校寄读。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何克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攻读文学。期间曾任牛津大学橄榄球俱乐部秘书和校队队长。姨妈的和平主义思想、瑞士国际学校的民主气氛、牛津大学追求卓越及自由公开的精神对何克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 年夏何克大学毕业，恰好姨妈在准备进行一次与和平主义事业有关的环球旅行，何克的父母支持何克陪同姨妈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体验。于是何克告别了父母和故乡。在美国，为了节省经费，何克采用搭便车方法，独自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1937 年 11 月，何克来到日本，通过参观合作社事业，他认为合作社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可发挥重要作用。

此时的日本已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从小受和平主义影响的何克，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他迫切想了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1938 年 2 月，何克只身一人来到中国上海。

采访中国抗战的西方记者

在上海，何克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心灵受到了极大地震惊。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的如此卑微：大批难民竟然在大街上吃饭、睡觉、生孩子、死去。不久，在姨妈帮助下，何克成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名通讯员。此时的中国，大部分人都在关心日军军事进攻，但何克更关心的是那些流落街头的中国难民，他决定留下来帮助中国人民。他给姨妈写信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中国。”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真相以后，何克决定去中国的临时首都武汉看看。

1938 年 3 月，何克来到中国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住进了武汉美国圣公会的一所住所。当时，这里汇集了大批采访中国抗战的西方记者，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推荐下，何克认真拜读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帮助何克正确认识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史沫特莱还介绍何克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这份工作不仅使何克拥有了记者资格，而且给他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何克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西方记者，他发表在西方媒体的

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1938年6月,何克幸运地成为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西方记者。在延安,何克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成千上万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奔赴陕北。他发现延安没有特权,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十一人都住窑洞,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信心十足,士气高涨。延安的所见所闻深深地感染了何克,使他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中国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抗日力量。

1938年7月,何克回到汉口。为了真实地报道武汉大撤退的情况,何克甚至坐上一列送难民离开武汉的火车,并把在火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发表在西方媒体。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时,何克等最后十八名西方记者被日本人强行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回到上海后,日本人继续对他施加压力,1939年2月,何克离开上海到了日本。

1939年3月,何克悄悄离开日本,绕道朝鲜来到中国北京。在北京期间,他被美国美联社聘为特约记者。不久,何克启程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但不幸的是,在离开北京不太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里,何克患了伤寒病。他头痛欲裂,浑身颤抖,并连续高烧不止。幸运的是,一名教会医院的新西兰籍女护士凯瑟琳·霍尔(中文名字何明清)救了何克。当时霍尔正从北京赶往河北邢台宋家庄的乡村诊所途中,正好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霍尔在华北等地传教行医时,在河北邢台山区一个叫宋家庄的小村庄设立了一间乡村诊所,为当地农民服务。抗战爆发以后,她经常利用便利条件,跨越日军防线帮助

抗日游击队运送人员和药品等。并与白求恩大夫结为挚友,帮助白求恩医疗队从北京购买药品和器械等。霍尔把昏迷中的何克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走了整整4天。路上何克病情加重,因为担心他的生命,霍尔找到了何克身上的皮夹子,知道了他的身份。到了宋家庄以后,尽管没有必需的药物,霍尔还是采用各种办法,帮助何克治疗,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宋家庄是八路军的游击区,清晨,躺在床上养病的何克能听到当地民兵的集合哨和八路军的起床号。大病初愈后,他主动参加宋家庄抗日民众组织的各种活动,接触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他给农民的孩子教唱他从延安学来的抗战歌曲,跟着乡村教师学习中国话。在宋家庄,何克开始真正接触了中国农民,他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淳朴和力量。

一天,几位八路军官兵把何克接到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会见了。在聂荣臻司令员安排下,何克走访了晋察冀边区主要辖地,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参加了边区政府召开的抗日救亡群众大会,与边区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期间,在八路军护送下,何克冒着危险迂回穿梭到达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接见。在边区近四个月的采访途中,何克经常用随身携带的英文打印机,把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写成报道,通过秘密交通线寄给美联社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

工合西北办事处的“洋秘书”

1938年6月,何克在武汉认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当时正在紧张筹备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中国工合运动)的艾黎热情邀请何克参加中国工合运动。中国工合运动是抗

战爆发后,由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艾黎等国际友人与一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内地乡村工业的社会进步运动。它得到了国共两党和美英等国的大力支持,是当时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国工合运动在改善后方人民生活、增加军需民用产品供给以及争取美英等国支援等方面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历史贡献。1939年10月,何克到宝鸡投身于中国工合运动,并担任工合西北办事处宣传秘书。何克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他在给家人信中说:“这真是个好差事。既可以搞工业,又可以从事社会工作,两者结合得再好不过了,同时又有机会写作和旅行,可以大量接触中国真正的老百姓——善良的农民,还有那些最具备社会觉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国力极为悬殊的一场战争。如何争取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抵制,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以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为代表的国际友人是中国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际友人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真实报道中国全民抗战的顽强精神和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为争取西方大国朝野力量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何克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士》上发表“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中说:“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的苦干,如果你走过他的住处,就能听得踏踏踏……打字机跳动的声音。如果有什么请他译述的文件,你只要和他详细的说一遍,他就能很好的译述出来,对工作从来不倦怠,冷热寒暑,都一样的努力。”“为了汇集材料,他也到各工合据点视察。他很能吃苦,一天能跑一百多

里路,能吃中国茶,能吃中国菜、中国饭,到了合作社,调查十分详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际报纸发表,所以他代工合的宣传,在国际间有很大的效用。”何克虽然是个外国人,但他与工合中国同事同甘共患难,赢得了工合运动各方的普遍赞誉。1945年9月,《工业合作》发表文章评价何克说,“在他服务工合的六年内,晋、豫、陕、甘各地工合社差不多没有一个他没有视察过。无论是在严冬或盛夏,几乎每天骑着一辆脚踏车在各地跑。他和普通社员一样的吃小米饭、穿草鞋、睡地铺,真正和社员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他说一口流利陕西话,并且很会唱歌,所以最受工合社员与学生的欢迎与敬爱。他这种对事业始终一贯的热诚,对合作社实际情形的深切了解,那种与社员学生甘苦与共艰苦耐劳精神,就是在中国同工中也很少有,的确堪称工合模范战士。”1944年,何克根据自己在中国北方采访见闻及在中国工合运动经历,写了一本纪实性报告文学《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外国“养父”和中国“养子”

何克在西北工合曾认识一名叫聂长林的同事。1940年底,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聂长林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决定他立即撤离。他突然离家以后,家中只剩下了身患重病的妻子及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撤离前夕,何克答应帮助聂长林关照他的家人。1941年5月,何克托人终于找到了聂长林家人,他立即把聂家老大老二送到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8月,何克得知聂的妻子病情严重危在旦夕时,又马上雇人用担架把她送往宝鸡工合医院进行抢救。并委托邻居照顾聂家老三老四。不久,聂的妻子因病去世。老三老四被送进了工合“战时儿童保育院”。一

天,何克去保育院看望两个孩子时,看到保育院里生活条件极差,孩子们靠喝稀粥度日,而且都患有痢疾、疟疾和眼病等疫病。见此情景,何克毫不犹豫又把聂家老三老四带回双石铺,给他们洗澡换衣服,抹硫磺膏,医治身上的疥疮。就这样,四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终于团聚在双石铺的艾黎和何克窑洞里,从此他们有了外国“养父”和新家。1942年3月8日,何克在给父母信中说:“我现在收养了4个儿子……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只虱子,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我把它烧了。我给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两条新裤子。再一次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共只有3只跳蚤。骄傲的父亲在微笑。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1944年底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甘肃山丹途径兰州时,4岁的老四患了严重的百日咳。何克带着他四处求医,亲自护理,为他喂饭打针,守护身边寸步不离,终于渡过了危险期。1945年7月,何克因病不幸去世后。艾黎承担了继续照顾老三老四的重任。艾黎和何克不仅是这四个孩子的外国“养父”,也是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六十多名及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四百多名中国战灾难童和西北贫困农民孩子的外国“养父”。

在中国人民遭遇灾难最严重的抗战年代,两位国际友人用他们的大爱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为这些异国他乡的穷苦孩子创造了温馨的大家庭氛围和吃饱穿暖和掌握技能学习文化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有力地鼓舞和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在人类慈善救济救灾史上也非常罕见,他们的大爱精神和扶贫济困善举应该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册。

培黎学校的奠基人

从1940年开始,中国工合组织陆续在陕西

宝鸡、江西赣县、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河南洛阳、陕西双石铺、广东韶关、广东南雄等地创办了八所工合培黎学校。“创办培黎学校的目的是从合作社中招收年龄较小的徒工,教他们读书写字,学习技术原理和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使他们学成后成为合作社的技术骨干。”也就是说,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并不是从事正规教育的学校,而是中国工合的内部培训机构。之所以要用“培黎”的名字命名中国工合的培训机构,一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美国福特公司合作创办了一所培养高素质中国工业技术人才的半工半读性质的研究生院。他培养的学生以后被称为“培黎弟子”,其中大部分人跟随艾黎参加了中国工合运动,并担任重要领导工作。艾黎1928年就认识了当时正在上海创办工徒训练学校的约瑟夫·培黎,并非常赞赏他提倡的发展工业拯救中国的思想和通过半工半读实践培养技术人才的教育理念。二是当时中国工合运动非常缺乏资金,用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名字命名中国工合培训机构,显然更有利于在美国募集资。

由于艾黎一贯坚持必须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给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公平分配海外募集资金的原因,1942年9月,国民党行政院免去了艾黎中国工合协会顾问职务。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打击,艾黎对抗战和中国工合运动的前途仍然满怀信心。他在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从此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在陕甘两省创办和发展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上。

由于战局影响和经费短缺等因素,到1941年底,各地的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先后停办,仅剩下一所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42年春天,艾

黎和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推荐乔治·何克担任了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在双石铺培黎学校,何克充分发挥了他的杰出才华。他不仅彻底扭转了该校的被动局面,而且为中国工合培黎学校事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1945年后改名为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创办于1941年春,创办人是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和总工程师吴去非。因抗战形势艰难和经费短缺等原因,该校创办仅一年就更换了八任校长。到何克接手该校时,这里一片混乱。只剩下1名教师和15名学生。学校只有三间教室和两台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设备。没有明确的培训计划,没有学生宿舍,学生普遍吃不饱饭,倦怠冷漠,不少人身上还长着疥疮。

何克上任以后,把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八路军优良作风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培黎学校:他首先从改进学生生活入手,增加了学生宿舍,开辟了菜园,改善了伙食,统一了学生服装。其次,何克聘请了几位优秀青年教师,从各地合作社新招收了几批学生,还招收一些流亡的战灾难童,扩大了学校规模。第三,何克引进一批生产设备,建立了小工厂和实习场地。在嘉陵江上安装的水轮机昼夜不停转动,带动纺织组的纺纱机正常运转。组织难民进山烧砖烧石灰和伐木,扩建学校建筑。第四,他每天早上带领大家去河边跑步,夏天中午带领大家去河里游泳,同学们不仅身体健康得到改善,而且士气明显提高。第五,何克采取艾黎倡导的“亲情教育法”,像父母一样照顾同学们,为孩子们治病,花费时间倾听他们的不幸和困难。为他们缝补衣服,涂抹硫磺药膏,沐浴时给他们擦背。营造家庭气氛,引导孩子们以校为家,以

工合为家。第六,针对学生来自东北和西北不同地域,容易产生矛盾的现实,他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鼓励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防止拉帮结派,逐渐使他们凝聚成一个团结集体。第七,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唱抗战歌曲和民歌。第八,成立伙食、墙报、体育、娱乐戏剧、劳务、图书读报等六个学生管理组,每周召开一次学生大会,讨论学校重大事项。通过这些措施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第九,制定学生用餐、就寝和纪律等方面的制度。在艾黎的大力支持下,何克通过艰苦奋斗,双石铺培黎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1942年9月,艾黎又与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张官廉夫人王贤琳等人共同创办了工合兰州培黎学校,“这所学校办的比较成功。”1943年,艾黎还与金陵大学合作,创办了中国工合成都培黎学校。

培黎学校西迁甘肃山丹

正当艾黎和何克等人满怀信心争取双石铺培黎学校更大发展的时候,抗战工合运动和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面临的形势却日益严峻。一是1942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高潮,围绕着中国工合运动海外募集资金的分配,中国工合运动内部以孔祥熙为首的顽固势力和以艾黎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之间矛盾激化。艾黎被免去中国工合协会顾问,国民党双石铺地方当局也经常以种种借口百般刁难艾黎、何克及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二是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鄂湘战役),郑州洛阳相继失守,日军兵临豫晋陕三省交通要冲风陵渡,陕西潼关危在旦夕,陇海铁路终点宝鸡受到严重威胁,战火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师生的安全。三是1944年8月份以后,双石铺的国民党驻军强迫培黎学校16岁以上的男孩必须

征兵入伍,一些年龄大的孩子为了躲避征兵不得不离开培黎学校。而且国民党军队打算征用双石铺培黎学校房子作为兵营。面对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面临的这些极端困难,艾黎和何克开始筹备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搬迁。

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究竟搬迁到什么地方最有利发展?艾黎和何克一时拿不定主意。艾黎到兰州征求老朋友张心一的意见。张心一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他不仅对甘肃情况非常熟悉,对工合事业也热情支持。他认为甘肃河西走廊山丹比较合适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发展。首先,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相对薄弱,政治干扰比较小,培黎学校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和技术培训。其次,这里有大量空房子,可供培黎学校使用。第三,山丹有生产煤炭、皮革、陶瓷的原料和基础,可以发展小型乡村工业。第四,这里可以利用祁连山雪水发展农牧业。1943年秋,艾黎陪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考察玉门敦煌时曾路过山丹,对这里印象深刻。他认为张心一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把中国工合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到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古城山丹去。

新的校址确定以后,艾黎和何克就着手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是艾黎亲赴兰州、山丹,与地方政府接洽搬迁事宜,并在山丹租赁了一座古庙和几间民房。二是把成都培黎学校的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双石铺。三是把双石铺培黎学校的设备和资产全部打包装箱准备运走。四是准备各种运输工具和御寒衣物。

搬迁工作从1944年11月开始,到1945年3月初结束。60多名全体师生、工人和重约15吨的设备资产分成两批搬迁队伍,经过1200多公里艰苦跋涉,终于安全到达山丹。第一批搬迁队伍由艾黎负责。1944年12月

初,33名师生和工人以及一些重量较轻的设备乘2辆汽车离开双石铺到兰州与艾黎汇合。1944年12月21日,艾黎和师生及工人乘坐四辆汽车从兰州出发,于12月25日到达山丹。第二批搬迁队伍由何克负责。搬迁队伍由30多名师生、工人,1辆卡车、5辆马车和20多部自制的手推车组成,于1944年12月底离开双石铺。当时正是当地2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一路上寒冷无比。孩子们跟在马车后面步行,并轮换着坐马车休息一下。队伍在崎岖不平到处都是冰雪的盘旋山路上整整走了五天,才艰难地走完了一段57公里的盘旋山路。途中有两辆马车翻车,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搬迁队伍于1945年春节前到达兰州,经休整准备后,于1945年2月底乘坐七辆破旧汽车浩浩荡荡离开兰州,于3月5日到达山丹。整个搬迁工作得到了中国工合兰州事务所和中国工合兰州培黎学校的大力支持。

“我的一切交于培校”

何克到达山丹后,马上投入到繁重的重建培黎学校工作中。艾黎则东奔西跑,争取中国工合协会同意搬迁及改名等事宜。

7月9日,艾黎回到山丹,一下车就感受山丹培黎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何克“把学校处理的更加井井有序。这样显著的进步很使我惊异。学生们的精神很好,技术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学校,我们所努力企求的那样的学校。”但艾黎同时也担心何克的健康。因为他“看到乔治的大脚趾肿了,露出在他那双太小的草鞋上。据他说是砸了一下,脚趾甲下面起了泡。”

7月15日,艾黎在日记中写到:“乔治到西大街来一次,说他的脚有点酸痛,因为房里没有碘酒,他用热肥皂水洗了一下,抹上硼酸膏包扎起来。……他正在忙着进行运动会,各

处布置一切。宴请地方绅士酬谢他们帮忙，和排解许多人事问题。他看着比往常要疲倦得多。”

7月20日，学生邀请艾黎带领他们出外旅行三天，艾黎不放心，决定“还是回去照顾乔治，因为他的病势不佳。”师生们出发不久，何克开始出现抽搐，艾黎马上派人请来山丹卫生院两名大夫，他们确定何克得了破伤风。艾黎马上给工合兰州事务所和玉门油矿发电报打电话寻找血清。还安排了四名学生范文海、樊国强、孙必栋和任重远昼夜轮流看护何克（笔者曾采访过其中两人）。艾黎在这天的日记中写到：“在停止抽搐期间，他神志清楚地谈着关于培校的事情，对于这些那些表示关心。……他说话很困难，但他总想说话。他不愿意让学生们知道他病的很重，希望他们继续他们的实习工作。”趁着抽搐停止的时间，“乔治要一张纸，虽然他不能很好的站起来，由我们扶着他，他写下：‘我的一切交于培校，由艾黎经管。（签名）乔治·何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他说他要努力和病魔奋斗，一定要挣扎下去。”

这天，艾黎看到何克“痉挛的更加厉害了，牙咬的更紧，每一次抽搐都显得极大痛苦。”心急万分，他又派专车去武威教会医院请徐上达大夫。7月21日上午，徐大夫赶到山丹并担任何克主治大夫，但是他也没有治疗破伤风的血清。下午，何克“情形又好了一些，痉挛的时间缩短一些，一切看起来很有希望。”兰州也来电报说，张官廉主任带着两位医生及血清已从兰州出发赶往山丹。

7月22日上午，何克病情突然加重。“十二点以后，一阵长时间的痉挛，足有一个钟头。隔了很短的功夫又接着一阵剧烈的痉挛。水喝进的很少，不停地咽气。实行人工呼吸，仍再也不能使他转过气来。”就这样，年仅30岁的

何克不幸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山丹长眠了。

7月23日上午十时，培黎学校为何克举行殡葬仪式。这天，山丹“风清日丽，祁连山巅覆盖皑皑白雪，景象至为雄伟。墓前有一湾清澈的溪流从白杨丛潺潺流过。坟墓建筑得很好，墓穴四周砌着砖石。”“在学生们将他抬入棺内之前，我们先将一条工合军毯放在下面，随后又在他身上覆上一条培校自制的毛毯。学生们赶做了一面校旗，旗上签着每个人的名字，上面写‘亲爱的老师’等等。棺材上面也覆上一面校旗，四周镶上黑边。十六位学生抬着沉重的棺材，二十个学生举着两长幅盖在棺柩的白布，地方各界领袖在后面恭送，其余的学生们遂跟在最后。到了墓地，举行仪式时间并不很长，因我们怕大家过于悲痛了。唱培校校歌，全体向死者三鞠躬。随着柩上加覆木板，接着学生们往上面抛土，在砖墙之内堆成墓堆。”殡葬刚刚完毕，张官廉带着兰州两名大夫匆匆赶到山丹。他为失去何克这样优秀的英国青年痛心疾首。

何克去世25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七年抗战艰苦岁月的何克，却没能亲眼看见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名留千古

为纪念长眠在山丹的乔治·何克，1945年7月，艾黎责成范文海同学负责，为何克修建了一座墓地。墓地前树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何克的简写英文名字“GAH”和“1915—1945”。以后每年的7月22日，培黎学校的师生都在这里举行纪念何克的活动。

198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山丹县城南门外恢复重建了“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何克陵园；1988年4月，按照艾黎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山丹何克陵园，山丹何克

陵园从此改名为山丹艾黎与何克陵园。陵园正面大理石照壁上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大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欢迎晚宴的致辞中说:“一位中文名字叫做何克

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本文作者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有删节)

雨中,给您唱支熟悉的歌曲

赵谦玺

乔治·何克是一个温暖的名字
温度一如生我的土地
因为太熟、太亲切
我们的交谈中总把“乔治”略去
这样,竟亲切的把您的国籍隐去
俨然我们亲生的兄弟
您绚丽的生命
在最靓丽的年份
停在了“30”的刻度
可是,您那坚定而有力的双脚
却丈量了地球自西向东的跨度
最终把自己留在了
让全世界都向往的丝绸之路
今天,是您离去后第72个祭日
有来自英国、新西兰和中国的人们
在您和您的挚友的陵园相聚
天空断断续续下着小雨
让我们体验者来自大不列颠北海的湿度
站在您的纪念亭前
凝视着纪念碑
那首吟唱给您的短诗
在耳边响起
在您墓前,我蓦然想起
您的生命已经跨越了

一个世纪
只是,在我们的脑海中
依然是您丰神俊朗的帅气
耳廓中,回旋的是
您带着伦敦口音教学生唱的歌曲
在雨中我们给您唱一支
您熟悉的歌曲
我们听到了陵园里回荡的歌声
我们听到了前赴后继的脚步
“30”不是休止符
是您给后来者
在苍茫的大海中立下的灯塔
在浩瀚的戈壁中留下的路标
仰望着它
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用责任来丈量世界的广度
仰望着它
我们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
用激情来体验文化融合的温度
何克先生
雨中,我们给您唱支熟悉的歌曲
2017.7.22

(作者系山丹艾黎纪念馆宣教室主任)

习仲勋的培黎情结

安永香 李生广



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中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上世纪80~90年代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路易·艾黎及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就有一段难忘和感动的往事。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4月来到中国,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抗日战争初期,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1943年底,他和朋友乔治·何克等人在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1953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迁至兰州。周恩来总理邀请艾黎到北京定居。虽然居住在北京,但艾黎时刻惦念着山丹,曾多次重访。1987年4月,由艾黎倡议,在甘肃省和

山丹县党政领导、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开学。艾黎视山丹为第二故乡,对山丹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中国的职业教育、石油工业都有很大的贡献,先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艾黎逝世后,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参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西北局工作多年的习仲勋,内心深处与扎根大西北的艾黎就有一种深深的情愫。20世纪80年代,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经常与艾黎见面,听取艾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考,探讨职业教育、文化建设等工作,并多次专门为艾黎祝福生日。1987年12月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楚图南等来到艾黎寓所。代表中国人民向艾黎祝贺90寿辰,恰巧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师生代表也来给艾黎祝寿,中央领导问候艾黎后还关切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在欢快的气氛中,艾黎提出希望习仲勋担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仲勋愉快地接受了艾黎的请求,并同学校师生代表合影留念。

重建后的山丹培黎学校如何健康发展,艾黎即使重病缠身也一直在思考,并和同事们经常探讨。1987年12月28日,艾黎逝世后的第二天,艾黎挚友、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马海德(祖籍黎巴嫩)召见学校校长倪才旺和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馆长王自刚,就学校发

展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过了一段时间,马海德和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一起去正式邀请习仲勋出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仲勋同意了邀请。

1988年4月21日上午,全国对外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为已故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士路易·艾黎隆重举行来华61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王震、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朋友一起出席会议,共同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第二天,习仲勋就在百忙中给山丹培黎学校亲笔复信,同意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复信全文如下:

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

来信收悉。我高兴地看到自1987年4月学校正式开学以来,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友好组织、友好人士的广泛重视和热情支持。同志们在重建和教学工作中发扬了老培黎的传统,为开发大西北、繁荣边远地区经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此谨向你们表示祝贺。

感谢你们的信任和重托,我欣然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名誉校长。我将尽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诚挚敬礼!

习仲勋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培黎学校师生收到习仲勋的复信后倍受鼓舞,表示绝不辜负期望,一定要把学校建设好,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习仲勋复信后不久,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了聘任书,聘任习仲勋为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名誉校长。

1989年10月28日,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隆重举行“艾黎故居”——雷台落成典礼,典

礼上首先宣读了名誉校长习仲勋发来的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

欣悉路易·艾黎故居落成,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即将在京召开,不能亲赴甘肃与你们一起参加艾黎故居落成典礼,请予鉴谅。希望你们继承和发扬路易·艾黎高尚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作风,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江泽民总书记国庆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改革创新,提高教学水平,努力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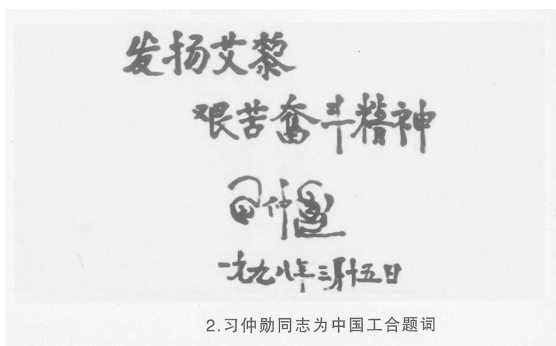
习仲勋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习仲勋自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名誉校长后,对山丹和培黎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要求省、地、县和有关部门大力发扬艾黎精神,把培黎学校当作特殊的学校来办,力争把学校建成甘肃乃至全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实用技术人才的培训基地。他积极协调解决了学校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物资困难等问题,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4年1月,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1998年1月,原甘肃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李纪阳前往深圳拜望在那里疗养的习仲勋。习仲勋关切地询问山丹培黎学校的情况,李纪阳一一做了汇报,习仲勋请李纪阳转达他对学校师生的问候,祝愿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好。快到告别的时候,李纪阳邀请习仲勋为学校题词。1998年3月15日,习仲勋为学校题写了“发扬艾黎

艰苦奋斗精神”的条幅寄到甘肃,表达了对学校浓浓的深情和关爱。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培黎学校师生万分悲痛。广大师生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继承优良作风,把学校建设得更加美好。

近年来,山丹培黎学校在各级党政组织和国内外友好团体、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2003年12月,学校通过“省部级重点中专”评估验收。2007年1月,又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习仲勋对山丹培黎学校的深情,已成为山丹人民和培黎学校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将鼓舞培黎学校师生,为再创辉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稿件来源自《党的建设》2012年第6期)

艾黎故居擂台简介



按原貌恢复重建的山丹艾黎故居擂台

1944年底,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迁至山丹。校址设在隍庙街一带的城隍庙、娘娘庙、操场和附近租的民居里。何克去世后,艾黎接管了何克收养的聂家四兄弟,并在学校旁边的擂台上修建了六间房屋,供艾黎和年龄小的孩子们居住。擂台位于城隍庙的东侧(现位于隍庙街东北角)，“擂台”曾名“雷台”，是人们用来祈神祭祀求雨用的,后

来,在附近设操场,又称马号,用来训练兵马。而“雷台”用来打擂比武,故称“擂台”。1945年后,艾黎和孩子们就居住在擂台上,在这里辅导学生和料理学生生活,研究和思考学校的发展问题。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十里店后,此处不再有人居住。随着城市发展,当年城隍庙的旧景已被楼宇覆盖,旧址的擂台也不复存在。1989年,为纪念路易·艾黎,激励培黎学子,在新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院内,仿原擂台模样重新建起了擂台。在擂台落成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习仲勋发来电报祝贺。2014年,培黎老校友周起秀将艾黎赠送他的“擂台上龙首下”印章,捐赠给山丹艾黎纪念馆。昔日的擂台见证了艾黎在龙首山下拼搏奋斗、艰苦创业的情景。

路易·艾黎拍的红军抗洪照

刘 波



这张拍摄于1932年的照片,收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因摄影者的设备有限,并不十分清晰,但其蕴含的历史十分独特,弥足珍贵。它是著名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所拍,内容是:一场特大洪灾之后,洪湖苏区的红军和群众正在抗洪救灾,修筑荆江大堤。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入夏以来,连降暴雨,江河猛涨。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堤防年久失修,到7月上旬,“鄂西各县半受水灾,受灾区域总计约二百方里”,灾民约5万,洪湖苏区过半地区受灾。为防止洪灾扩大及来年再次泛滥,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大力整修堤垸,兴修水利。

1931年底,红9师25、26两团指战员,在潜江田关参加堵口和保卫复堤工程,他们不畏敌军的“围剿”和敌机的轰炸,同潜江、荆门、江陵、监利2万多民工并肩战斗,在短时间里修起了一条7里多长的大堤,人民称之为“红军堤”。

洪湖遭遇的特大水患,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关注。国际联盟救济机构筹集了大量粮食、药品等发放给灾民。1932年初,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受国际联盟救济组织的委托,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从上海只身来到武汉。他排除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坚持要到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窝子”的洪湖考察。他同一名工程师冒着严寒,乘坐汽艇,在新堤泊靠,下榻于新堤地下特支联络站(现解放街220号)。在新堤,他看了官保堤,然后沿堤步行来到乡下。当时,郊区和乡下均为苏区和游击区。

在乡下,路易·艾黎亲眼见到苏区群众抢修堤防的情景,十分激动,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

路易·艾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里,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我们的眼帘。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建造着曾被冲垮的大堤,极目远眺全是劳作的场面。我回到武汉之后报告了这个真实情况,之后就再没有人对向该地区运送救济小麦持反对立场了。”

在同堤工的谈话中,路易·艾黎了解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救灾和修堤,苏区广大农民自备伙食参加水利建设。他亲睹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救灾和修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洪湖苏区的救灾给路易·艾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回忆说:“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希望的幻灭,也加强

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回顾在洪湖苏区的这段往事，联系洪湖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写下了《洪湖精神》一书。洪湖精神，成为

我国红色精神中唯一一个由国际友人提炼总结的精神。路易·艾黎本人，从此也与洪湖结下不解之缘。

（本文来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8.4，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

早期的工合刊物

工合运动在组织工业合作社进行生产的同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工合文化。《西北工合》《工合画刊》等刊物的创办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支持。他们创作了大量与工合相关的文章、诗歌、歌谣、歌曲，向社会各界介绍工合运动，向社员灌输工业合作意识，鼓励社员和民众积极生产、支援抗战。

《西北工合》

《西北工合》创刊于宝鸡，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编辑委员会编辑。其中包括《西北工合月刊》、《西北工合周刊》、《西北区工合动态》、《陇南工合》等。属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刊物。主要撰稿人有杨汉平、许效衡、司玉溪、罗伦、索开、汪源金、王良骥等，设有论著、工作介绍、通讯、参考资料、工作情报、时事简讯、附录等板块。该刊主要刊登宣传介绍工业合作运动的文章，包括资源调查、通讯与时事述评等，还有文艺作品等。



《工合画刊》

1940年9月创刊于西安，为月刊，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编辑并发行。1941年5月停刊。属于综合性画刊。晨钟、王亚平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陈执中、罗伦、克难、王亚平等。主要有木刻专论、漫画、工合杂著等栏目。该刊物应“建设经济国防，抵抗日本人”的口号而产生，载文分为“漫画木刻”和“文字”两版，内容通俗易懂。



漫画：巩固大西北，要建设西北国防工业



漫画：青年朋友这里需要你



漫画：柳翼下的汪逆



漫画：傀儡之戏



漫画：抗战的显微镜下



给予和平卫士的最高礼遇

——毛泽东邀请路易·艾黎参加国庆观礼请柬



此文物是毛主席邀请路易·艾黎参加国庆宴会的请柬和参观国庆观礼的胸条,请柬为长方形卡片纸,长21.8厘米,宽12.2厘米。胸条为丝绸烫金,宽4.5厘米,长19厘米。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山丹艾黎纪念馆。

1952年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在山丹的路易·艾黎和另一位新西兰教师艾启赫收到北京寄来的邀请函,请他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出席会议。6月,路易·艾黎和艾启赫去北京参加筹备会议。

9月30日,路易·艾黎受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了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宴会,并受邀参加国庆观礼。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民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庆祝典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

四次国庆阅兵。国庆典礼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扩建,并修建了观礼台,广场显得更为宽阔与雄伟。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等领导人出席了典礼并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武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在观礼台上的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农业、水利工程和铁道工程中的劳动模范、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和模范工作者;还有一些国家的华侨回国观光团,以及一些来访的外国代表团、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来自30多个国家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等。

庆祝典礼于上午10时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国庆典礼开始,军乐团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充分显示了中国三年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阅兵观礼分为天安门城楼与观礼台两部分,而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通常登上城楼的人选是各代表团团长,包括来华国家元首、总理,以及一些国外知名

人士。路易·艾黎的座位安排在紧挨着天安门城楼东侧最近的那个观礼台。

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3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表达了当时亚洲和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对和平的殷切希望,指明了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新西兰副团长的路易·艾黎在发言中

说:“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是永远无法切断。”

1953年底,路易·艾黎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定居北京。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与团结的事业,积极向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稿件来源自甘肃省文物局网站2021.7.24)

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强调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新华社发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2021年大事记

◆4月23日,2021年第1期《培黎通讯》(总第36期)出刊。

◆5月28日,我校入选首批甘肃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

◆6月1日,学校党委调整任命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负责人,石虹同志兼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董沼同志为副主任。

◆6月18日,“新时代斯诺”国际论坛在延安举办,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沼参加并在论坛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6月19日,中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张晓敏一行参观培黎展览馆。

◆6月21日,学校举办“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专题宣讲会,省市区领导及校师生500余人现场参加了宣讲会,超30万人次通过网络直播关注了活动。

◆7月2日,由校党委宣传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办,学校档案馆承办的“档案里的艾黎校长”图片开展展。档案馆立足馆藏资源,遴选出近100幅图片,生动表现了路易·艾黎在培黎学校留下的光辉足迹。

◆7月15日,由校党委宣传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办,艺术设计学院承办的“永远的艾黎——校史中的红色印记”学生版画和剪纸展在培黎展览馆展出,共展出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版画》和《剪纸》的课程作品50多幅作品,作品以艾黎、何克人物形象为元素,生动表现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7月23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

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来校调研指导工作并参观培黎展览馆。

◆7月25日,在甘肃省教育系统“红色基因传承行动”教育活动成果展中,我校师生有5件作品获奖,其中艺术设计学院教师杨广银的油画作品《路易·艾黎》获绘画类一等奖。

◆7月26-28日,校党委宣传部大学生记者团开展“追寻红色遗迹 传承艾黎精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7月27日,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开展2021年度课题申报工作,全校共申报13项课题。经过中心组织专家评审,遴选立项重点课题1项,一般课题12项。

◆8月12日,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撰写的文章《路易·艾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在《甘肃日报》发表。

◆8月15日—9月15日,党委宣传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对培黎展览馆部分展陈内容进行更新和调整,共更换展板图片60余张,并对馆内相关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和完善。

◆9月16日,由中国福利会主办,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作为支持单位,兰州城市学院和中福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史迹展在我校培黎校区开幕,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等领导嘉宾和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开幕活动并参观了培黎展览馆。王家瑞欣然为学校

题词：“践行艾黎精神 培养时代新人”。

◆9月17日,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及培黎展览馆开展培黎记者团纳新工作。

◆9月19日,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恢复运营。

◆9月29日,兰州城市学院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国际友人亲属复信精神座谈会。

◆10月11日-13日,张掖市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在我校举办“庆祝建党百年 传承红色薪火”高金城烈士事迹展并开展馆际交流活动。

◆10月13日,山丹县“艾黎足迹寻访团”一行26人参观培黎展览馆。

◆10月15日,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展览馆被兰州市委宣传部授予“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1月30日,兰州城市学院纪委监委专

员办公室党支部邀请省纪委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党支部、派驻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党支部来校联合开展“永远和党在一起”主题党日活动并参观培黎展览馆。

◆12月2日,学校举办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24周年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2021年年会。学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及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研究员等共50余名嘉宾通过线上线下参加了年会。

◆12月30日,经甘肃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旅厅遴选和评审,由兰州城市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山丹艾黎纪念馆联合申报的“培黎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项目获批甘肃省首批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12月31日,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展览馆获批加入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

(上接第18页)在北京,经过各方的努力,工合协会于1983年恢复工作,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如邱茉莉、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魏璐诗(Ruth Weiss)、大卫和伊莎白·柯鲁克(David and Isabel Crook)夫妇等都积极参加恢复后的工合协会的活动。1985年夏,艾黎又重新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他自己任主席,卢广绵、陈瀚笙、陈必娣、沙博里(Sidney Shapiro)以及远在美国的丁恩(Hugh Deane)、理查德·帕斯特(Richard Pastor)、海伦·斯诺、玛格丽特·斯坦利(Margaret Stanley)等任委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工合国际委员会正式恢复活动。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活动后,得到了比利时“兄弟为了人类”、加拿大合作社协会、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等组织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援,支持工合国际积极开展新时期推动在中国建立符合国际合作社联盟所

倡导的合作社发展工作探索,服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截至目前,工合国际已拥有中、澳、德、比、加、日、新、英、美等国的个人委员500多人,许多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加入了工合国际,积极参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合作社发展工作。30多年来,工合国际先后与ICA(国际合作社联盟)、CICOPA(国际工业、手工业及生产服务者合作社组织)、CCA(加拿大合作社协会)、世界银行,以及德国、斯洛伐克、西班牙、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英国、比利时等海外合作社组织、合作社促进组织以及对华友好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来源自《国际人才交流》2020.7,作者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